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胜利万岁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内部学习·注意保存)



最高指示

我党历史上曾經有过几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軍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記了国民党将要襲击我們。結果犯了陈独秀路綫的錯誤，使这次革命归于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战的条

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綫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轟轟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綫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

年。抗战起来了，統一战綫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綫有某些相似的錯誤。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驕傲，几次錯誤，都要引为鑒戒。

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个路綫，一种观点，要經常講，反

复講。只給少数人講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綫的正确和組織上的巩固。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綫方面的教育。

团結起来，爭取更大的胜利。

林副主席指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們必須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

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的学习和宣傳，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傳，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繼

續革命的學說的學習和宣傳，都不能只進行一次，而要反復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只有這樣，才能使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剛冒頭時，就受到廣大黨員和人民羣眾的批判和抵制，保證我們黨始終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

目 录

- 第一講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1）
- 第二講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104）
- 第三講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的……………（164）
- 第四講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的……………（227）

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

第一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战胜陈獨秀叛徒集团的

(录音稿，未經本人审阅)

同志們，战友們：

三办的負責同志今天要我来跟同志們一起学习我們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来歌頌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績，来批判以陈獨秀、王明、刘少奇三个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左”右傾机会主义路綫。毛主席曾經教导我們：“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一个路綫，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給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为什么講一个路綫，一种观点，要经常講，反复講呢？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里曾經講到这样的問題，講到我們党的壯大、发展，我們党的事业的胜利，她不是和和平平发展起来的，是經過斗争的；特別是經過党的两条路綫的斗争。林副主席在报告的第六部分講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綫斗争的历史。我們党正是在两条路綫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壯大起来的。我們党的两条路綫斗争史，是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战胜了三大叛徒集团，我們党巩固、发展、壯大起来的。毛主席的革

命路綫是代表了我們黨的正確路綫，那么在“九大”的公報里面提到了學習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史的重要性，“九大”公報里講到四個才能懂得，就是學習48年來，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史的經驗是當前重要的學習內容之一。下面講到四個才能懂得，只有懂得黨的歷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是一個懂得；下面講第二個才能懂得，才能懂得毛主席的偉大；第三個懂得，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第四個就是才能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正確。公報里，同志們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講到學習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史，有四個才能懂得就是學習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史，特別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來兩條路綫鬥爭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發展了馬克

思列宁主义，才能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才能懂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今天，我想和同志们来一起学习我们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

第一个问题，就叫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因为林副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党是战胜了三个叛徒集团的，巩固、壮大、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就讲第一个叛徒集团。怎么样战胜它的。陈独秀叛徒集团是在我们党内最早出现的，危害最大的一个叛徒集团。陈独秀叛徒集团它断送了我们党的第一次大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我们党建立以来最早出现的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是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陈独秀叛徒集团，在革命的紧要

关头，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而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毛主席在“九大”做了多次的极其重要的講話。毛主席在講話里面，几次提到我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大革命期間的历史經驗教訓，毛主席的講話給我們指明了学习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的最正确的方向，我們学习这个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怎么样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最好的教材就是毛主席的著作，所以同志們主要的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那几篇呢：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級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四篇著作。阶級分析，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詞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志們在学习这四篇光輝文献的时候，就可以使我們更好地去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怎

么样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陈独秀叛徒集团已经老早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历史重新翻开来呢？今天为什么来学习呢？来批判呢？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批判陈独秀叛徒集团，那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接受历史上的教训，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斗争。因为陈独秀叛徒集团它的危害很大，今天我们接受历史上的教训会指导我们今天的斗争。那么，下面我想分四个方面跟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

第一个问题，在建党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個問題，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的
兩條路線的鬥爭；

第三個問題，講講陳獨秀叛徒集團的
危害；

第四個問題，講一講陳獨秀叛徒集團
的可恥下場和歷史的教訓。

我們學習歷史的目的，就是要指導今
天的鬥爭，指導今天的鬥批改，接受歷史
上的教訓。

第一個問題，講建黨問題上的兩條路
線鬥爭。在這個時期之內，毛主席的無產
階級革命路線和陳獨秀的機會主義路線之
間，鬥爭的焦點，第一個焦點就是在建黨
路線上的鬥爭，就是無產階級要不要在中
國建立自己的革命黨？建立一個什麼樣的
黨？要不要建立自己的革命黨，建立一個
什麼樣的黨。因為我們今天學習這段歷
史，它的時間基本上包括一九二一年到一

九二七年左右这段时间，我們战胜陈独秀叛徒集团的，主要是学习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这一段党的历史。那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和陈独秀叛徒集团之第一个斗争焦点是在建党路綫上。为什么这样講呢？这跟当时的我們党产生的社会条件、历史的背景、当时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我們可以用三句話来概括我們党当时产生的情况，一句話：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第二句話：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三句話：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綫战胜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綫的結果、伟大成果。那么，我們分別从这三句話来看看，学习当时的情况，一句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为什么我們党产生在一九二一年呢？我們党产生当时

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国内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了解得更清楚，就是我們党在产生之前，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鴉片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那么当时反动的清朝政府同它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自此之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統統的侵入了中国，把我們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的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我們中国人民在外面要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在内部要受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清朝政府啊，北洋軍閥啊，地主买办阶级啊，它的殘酷的压迫和剝削。那么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得英勇不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历史上来看，有两次大斗争比較著名的。一起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

爭；一起是孙中山为首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些斗争，虽然給予帝国主义一定的打击，但最后都失败了。所以历史证明，农民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但是要作为革命的領導，領導階級，把革命領導到最后胜利，还不行，这有它的小生产的經濟地位决定了的。資產階級它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一个很大的弱点，是軟弱性、动摇性，因此也不能領導革命到最后胜利。因此到了一九二〇年这个时期，历史已經逐步逐步发展就是經過农民領導革命不能胜利，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也不能胜利。因此，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領導者，就需要工人階級，新兴的工人階級政党来担負領導革命的重任，所以說我們党的产生她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符合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要求，农民进行領導革命斗争失败了，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斗争又失败了，怎

么办呢？需要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来领导，所以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要无产阶级的政党来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来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党的产生，她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因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解放。第二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那么党有中国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需要新的领导者，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来领导革命。那么在一九二一年时候有没有这个条件呢？一九二一年那个时候，产生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都具备了，都成熟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可以分两个方面讲，一个，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在中国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就为什么

我們国家农民、資产階級領導革命不能胜利，而列宁領導无产階級革命政党为什么能把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呢？这給人們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得出結論的結果一个，列宁他有一个政党，这个政党是无产階級的政党，是用馬列主义武裝起来的政党。因此中国人民就产生了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样的要求，而十月革命之后呢？馬克思列宁主义就傳到中国来，使我們中国人民找到了解放的思想武器。馬克思列宁主义傳到中国，那么就為我們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一个思想基础，有了指导思想了。另一方面，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爆发了一个反帝、反軍閥的斗争。在这个革命斗争当中，新兴的工人階級，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了雄伟的階級力量。那么当时先进的革命的知識

分子，以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为代表，看到了工人階級的雄伟力量，就把馬列主义到工人当中进行宣傳，把馬列主义傳播給工人，那么工人呢，接受了馬列主义武裝以后，它的階級覺悟呢就进一步提高起来了，就产生了自覺的产生和成立自己政党的要求。要成立自己的司令部，成立自己的先鋒队，因为階級嘛要通过政党来領導，政党是階級斗争的工具。你譬如說，当时工人的階級覺悟还不够高的时候，它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在当时社会上曾經流傳那么一句話，什么話呢？这个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同志們看工字不好出头的，一出头便成土字了。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入土总不大妙，所以覺得看不到自己的力量。那么經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共产主义者，对工人中进行馬列主义

宣傳，得到了馬列主義武裝提高了階級覺悟，那么就認識到工人要團結，團結就是天，力量大无边。同志們看工字下面一个人字，工和人合起来是什么字呀？合起来就是个天。工人要團結，團結就是天，力量大无边。本来是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入土中国話不大好听啊，不大吉利的嘛。現在認識到以后，工人要團結，團結就是天，力量大无边。当时的“五四”运动以后，經過馬列主義的武裝以后，工人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就产生了組織工会，要成立自己的政党，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工人运动就这样发展起来，就为我们党的产生奠定了階級基础。馬列主義是思想基础，工人运动是階級基础，就产生建立政党要求了，所以我们講我們党的产生，在一九二一年产生。她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

的必然結果。你還要內部條件，沒有內部，沒有階級基礎，沒有思想基礎，那還是成立不了政黨。第三句話特別是毛主席的建黨路線戰勝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我們建黨她不是平安產生的，同志們可以回顧一下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各國馬列主義政黨、小組，她們重建自己的政黨，她鬥爭多么艱巨。你譬如說：比利時，比利時原來有一個黨，後來它變修了，後來出來個格利巴，格利巴不是來到過中國嗎？他也標榜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毛澤東思想，那麼文化大革命一來呢，他的原形就暴露了。他是反對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也是一個修正主義貨色。因此，比利時現在出現了第三個黨，出現了馬列主義政黨。你象印度，印度原來一個黨變修了，後來又出來一個黨，又變修了，現在又出來一個馬列主義

的印度共产党，她是以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为指导的。象巴西它有两个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的党，富本显治修正主义路綫，現在日本各个地方呢正在成立馬列主义共产主义小組，正处在联合的过程中，同志們，我們看建党路綫的斗争是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斗争中是非常艰苦的。我們党呢，在二一年的时候，也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有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給我們撑舵，战胜了各个叛徒集团，使我們的党沿着馬列主义的軌道，不断地巩固，不断地壮大，这是我們大家的幸福。那么当时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建党路綫怎么样战胜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綫呢？这里可以举三个回合，当时啊毛主席組織了一个新民学会，那么曾經派了一部分人到法国、到俄国去留学，去学习欧洲的无产阶

級革命經驗，到法國去有蔡和森同志，有李維漢。到俄國去有任弼時同志，原來是過去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後去世的。那麼即使在新民學會里边，也曾經對建黨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當時在法國留學的新民學會委員當中，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當中出現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同志，就是蔡暢的哥哥，為代表的革命派的觀點，他主張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黨，搞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派呢以李維漢，同志們都熟悉的，即舊的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這個老機會主義者，以他為代表，他是主張改良主義，以合作社、以教育為改造中國的這樣一個工具，反對走十月革命道路。因此，這兩派都寫信給毛主席，請毛主席發表意見。那麼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毛主席就寫了一封信給這個在法國的新民學會委員，表

示深切的贊同蔡和森同志的意見，反對李維漢的改良派。毛主席曾經在和蔡和森同志的通信當中，闡述了自己的建黨思想。毛主席建黨思想，概括起來可以用四個方面講：一個毛主席主張我們自己建立的一個黨，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用當時的話講呢，就是唯物世觀，是我黨哲學的根據。唯物世觀，就是唯物辯證法。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這是毛主席當時就很明確的革命道路。我們黨走的革命道路。第二個問題革命道路，毛主席主張走十月革命道路，要高階級鬥爭，搞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當時有這麼兩句話，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者是帝國主義者，或者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翻了，就沒有自己肯收場的，那就是反動派不打不倒的觀點。毛主席還講，“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

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主張搞階級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温和革命論，就是对李維汉这些人所講的。

第三，毛主席建党路綫，組織原則，主張我們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組織原則，党的紀律，要是鉄的紀律，入党的条件，要相当严格，要吸收真同志入党，不要吸收假同志入党，真同志不是假同志，我們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同志。这种組織原則看来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第四，毛主席建党路綫，要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最終目的，不仅要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創造共产主义社会，主張我們党要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样子說明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当时就給我們党提出了一条馬列主义的建党路綫，这一条建党路綫和列宁的建党路綫基本原則是一致的。毛主席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进行了艰苦的

斗争，十月革命之后，毛主席两次到北京，学习、研究馬列主义。

一九一八年四月，毛主席在长沙組織一个革命的团体，这个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当中，毛主席领导了反帝反軍閥的斗争，而且也主編了一个刊物，这个湘江評論，这个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得很多了。在湘江評論里面，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样光輝的文獻，就指出中国革命，應該走十月革命道路，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的革命人民，要以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的六不怕的精神，来进行徹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軍閥的斗争。毛主席还指出辯证法的观点，帝国主义这么多入压迫我們中国，毛主席說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蓄之既久，

其发必速，爆发出来力量非常迅速，非常伟大。所以毛主席当时提出民众大联合，要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在一九二〇年八月至九月間，毛主席又在长沙创办了“文化書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到了一九二〇年九月，毛主席在长沙就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組。那么成立共产主义小組，就更有組織的去傳播馬列主义，去領導工人斗争，建立工会，把馬列主义和中国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为建立我們党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准备。毛主席領導的共产主义小組，代表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組最正確的方向。当时全国有八个共产主义小組，就是湖南、湖北、上海、山东、广州、北京、巴黎、东京，八个共产主义小組。所以毛主席不仅从理論上，而且从实际上革命的实践上为我們建立党，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那么剛才講了，毛主席和

新民学会里边的一部分人，两派，特别是斗争当中支持了蔡和森同志为首的革命派观点，批判了李维汉的改良派，这是第一个回合。第二个回合，在我国内，特别是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建党路线，改良主义的建党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陈独秀何许人也？陈独秀是安徽淮宁人，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两次留学日本，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当时他在编辑一个杂志，那是新青年杂志，出名了，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就标榜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在“五四”运动当中，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但是陈独秀这个人，他是空发评论，他是不参加工人运动，不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他是不与工人相结合的，不改造思想，所以陈独秀这个人从来不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他的世界观，他的阶级立场，还是资

产阶级那一套，思想上保留着好多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历史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那么过去胡乔木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吹捧陈独秀是我们党的发起者，而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贬低为仅仅是湖南的党内组织的代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为陈独秀树碑立传的，我们必须加以批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培育者。陈独秀不过是我们党内同路者，他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们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同志们我们可以对比的看一看，为什么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前面我们用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毛主席的建党活动来看，他是为我们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奋斗。而陈

独秀怎么样呢？我們对比看一看，一个，毛主席主張我們党的指导思想是馬列主义，很明確。而陈独秀呢？在当时，在二十年的时候，他說什么呢？他說他要把耶穌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感情，培养在我們血里面，將我們从堕落在冷酷、黑暗、齷齪的坑中救起。这是胡說八道，用基督教耶穌的教义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你假如我們党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去办不得了，那还成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党，那完全是修正主义、資产阶级的东西。第二个，毛主席主張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实行暴力革命，而陈独秀呢他鼓吹要拿英美作榜样，說美国大总统威尔遜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的思想状况完全是資产阶级一套。他还主張，不搞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用阶级調和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他說，我也以为有一种

法子，可以免除个人和社会間的矛盾和冲突，什么法子呢？就是說讓工人在年終分紅利的时候，这个紅利你不要拿回去，那么参加到股东里边去，入股了，工人分紅利入股东，那么工人逐漸地变成資本家地位，那么工人变成資本家，資本家还是資本家，整个社会都是資本家。因此社会就沒有階級矛盾了，完全是胡說八道，他这个协作社会，就是劳資协作，資本家就是靠剝削工人过日子，那里有整个社会都是資本家还去剝削誰呀！他有这样工人入股东，成为資本家，資本家还是資本家，那么社会上就沒有階級矛盾了，就可以改造中国的社会啦！不要搞階級斗争啦，完全是資产階級的一套。第三个对比，上面我們講过，毛主席主張我們党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要严格的物色黨員，要吸收真同志入党，不吸收假同志入党。陈独秀

在当时鼓吹我們要把有良心的，有知識的，有能力的人合攏起来，造成一个开明专制的局面。他強調有能力，有知識，有良心的人，这是些什么人啊，說穿了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豪紳。毛主席強調眞同志。要物色无产階級先进分子入党，保持我們先鋒队的本色。他是強調有良心有知識，有能力，那岂不是把我們党变成資產階級俱樂部了嗎？一个大杂燴了嗎？那还象什么先鋒队呢？第四个对比，毛主席主張要在全中国，不但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創造共产主义，要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陈独秀在当时他鼓吹什么东西呢，他鼓吹要英美的民治主义。民治主义說穿了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是假民主，搞資產階級一套，那里还說得上国际主义？談得上共产主义？毛主席主張要依靠人民羣众，为人民服务。陈独秀在一九二

錢月
手
記
一
年七月，这是我們党誕生的日子，陈独秀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說：“中国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狹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沒有公共性。”个人主义人人都有啦，一堆蠢物，一盤散沙，甚至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他还說

“羣众的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羣众，就失去理性，控制不住了”。刘少奇他鼓吹羣众落后論，陈独秀呢，是鼓吹羣众盲目論，羣众是盲目的、无用的，一盤散沙，一堆蠢物嘛，人人都有个人主义嘛，还有什么羣众观点呢？这那里还有什么依靠羣众的观点呢？那里还有依靠我們工人阶级的观点呢？那里还有什么阶级分析呢？那里还有对我們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最有远見，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这样一个阶级特性的認識呢？沒有。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产物

嘛，怎么人人有个人主义呢？无产阶级的
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
性，这是我们阶级的特性嘛，你假如是忠
于党的领导者，你怎么对于工人阶级的特
性也没有认识了？这说明陈独秀当时的
思想状况，他的建党路线是修正主义的建
党路线，完全和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背道而
驰的。胡乔木却把这样状况的陈独秀说成
是我们党的发起者，岂不是对我们党的污
蔑吗？我们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締
造、亲自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战胜了三大叛徒集团而巩固发展胜利壯
大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历史的中心，
历史的红线是在毛主席这一边，而不是在
陈独秀这一边。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看，
他的理论，陈独秀的观点是这样的，他的
具体活动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关心建立一
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呢？也不是的，陈独秀

本来沒有要建立共产党的打算和思想准备，而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历史的潮流卷进来的。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东方局，他所說了中国发生了一个“五四”运动，学生罢課，工人罢工，規模很大，影响很大，就派了个代表，叫做威金斯基，到中国来了解了解，打听打听，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威金斯基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釗，經過李大釗的介紹，就把他介紹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找到了李汉俊等。那么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就向他們介紹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情况，俄国列宁领导布尔什維克党的情况，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陈独秀投机革命，就参加討論建党問題，就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四月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了，五月他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組。那么陈独秀是不是

从此就转变了立场，转变思想来考虑建党问题呢？他不关心，陈独秀一心想当官，并不想革命。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孙中山在广东作了大元帅，打了个电报给陈独秀，请他当个教育厅长，陈独秀看了有官可当了，就把个共产主义小组这个事丢给李汉俊，他自己到广东做他的教育厅长去了，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这次大会他也不来参加，他还在广东做他的教育厅长。为了广东的大学造校舍，建一个大楼，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都不来参加。一九二三年党开“三大”的时候，陈独秀还讲过，工人阶级还不能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等到国民党胜利了再建立共产党不迟。一九二三年他还讲这个话，他在一九二一年并没有真正的组织共产党。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嘛，党的真正缔造者是伟大领

袖毛主席。如果按照陈独秀的建党路线去办，一九二一年那就不仅成立不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它是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此处听不清）。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建立起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当时只能是党的同路人。在建党问题上和陈独秀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听不清）那么经过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艰苦斗争，终于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推出了十二名代表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何叔衡是代表湖南的，陈潭秋、董必武是代表湖北小组的，李汉俊、李达是代表上海小组的。本来陈独秀是上海小组的，他不来嘛，所以李汉俊、李达代表

上海，刘仁静、张国焘是代表北京小组的，当时李大钊也没有参加，李大钊在北京参加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他也没有参加，所以刘仁静、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邓恩铭、王尽美是代表山东小组的，陈公博是代表广东小组，周佛海是代表东京小组。十二个代表代表了全国五十七名党员。那么这次出席“九大”的，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五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邓恩铭、王尽美，湖北的代表陈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四个人。张国焘这个家伙据说现在住在加拿大，叛国活动，反革命。刘仁静解放后，在北京一个师范学院里。还有这个李达，早两年去世了。武汉大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前去世了，

这說明了，抱着不同目的入党的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說明我們党是在斗争中成长壯大起来的。那么七月一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叫做兴业路，解放前叫望志路58号，現在叫兴业路108号，这是李汉俊的哥哥叫李素成的家里召开的12个代表，第三国际还派了两个代表，一个叫馬林，是一个荷兰人；一个叫尼克 罗 夫，是俄国人，派两人出席。在这个会议期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建党路綫，无产階級建党路綫又和机会主义路綫，“左”右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在討論建党路綫的时候，在会上出现了两个錯誤傾向，一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观点，是破坏馬克思主义的观点，說我們党現在不要搞階級斗争，只要宣傳馬克思主义就行，不要搞革命实践斗争。还有一种“左”的观点，是

关门主义观点，以刘仁静为代表的，不去领导农民革命，我们党只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毛主席在这个会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和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大会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大会决定建立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会议进行期间，突然有一个人，头戴礼帽，身穿足布长衫，戴了黑眼镜，随便报了个名字，把门帘消了，进来问，王先生在吗？问过后就跑了。引起了代表们的警觉，代表们互相一问，都没有人认识这个人，就马上从前门撤退。当时前门还没有房子，光是空地。兴业路在什么地方？就在淡水路和太倉路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地方还没有房子呢，前面一片空地、菜园，就从前门马上

撤退。不过一刻鐘，結果法国巡捕房开了两部警备車，有十几个巡捕就包围了会场。原来这个傢伙是包打听。包围了会场，进行了搜查，当时李汉俊还在家里，因为他是房子的主人，他哥哥的家嘛。結果包打听就問啦，剛才的人那儿去啦？那么李汉俊他会講法国話，他說“沒有呀，沒有开什么会呀！”“明明有人开会嘛，十几个人那儿去啦？”“噢，你剛才講人啊，不是开会呀，是北京大学的几个教授，放暑假了，沒有什么事情，随便聊聊，討論編教科書的問題，都跑了，沒有了。”結果那个巡捕也不相信，就进行搜查。因为当时开会比較簡單，也沒有挂什么标語呀，也沒有其他布置的东西，就是会上的几个文件嘛，油印的文件，文件卷放在口袋里就跑了，也查不到。那这当时的房主是李汉俊的哥哥李素成了。李素成

解放后当过我們的农垦部长。李公館是有点名气的。那么又搜查不到东西，最后，是扑空了就回去了。同志們，說明我們党建立过程里面，不但要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斗争，还要同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我們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說明当时环境多么危险。当时开会，要干革命，就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危险，不象我們今天这样安安静静的，这样放心的开会，来学习毛主席革命路綫，所以我們党是在斗争环境里产生的，帝国主义把共产主义、共产党看作洪水猛兽，怕得要死。結果为了会议安全起见，第二天代表們約好，就从早上七点鐘在北火車站集合，統統乘火車到嘉兴南湖，到游船上面去召开。那这买点酒买点菜当作游客进行了一天之长，胜利地結束了我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以最后一天会议在浙江嘉

兴南湖召开的。那么大会曾經討論了我們当时的政治形势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組織原則机构，通过討論制訂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綱領，包括党章，我們党的第一个章程是“一大”制訂出来的。通过了党的工作決議和选举了党的中央領導机关，就正式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么当时选举党中央机关，选出了三个中央委員，一个叫陈独秀，一个叫張国燾，一个叫李达，陈独秀当書記，張国燾搞組織工作，李达搞宣傳工作。陈独秀当时不是在广东当教育厅长嗎？那么他的工作暂时由別人代理，那么有的同志要問了，上面講陈独秀不是机会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唯心主义一大套嗎？“一大”又不来参加，怎么会选他当总書記呢？同志們，这个要看历史的条件，是呀！要跟我們当时历史环

境联系起来看，否則的話我們今天就不好理解了。因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在社会上呢有一定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他又标榜自己信仰馬克思主义，后来当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組負責人，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間，他去广东做教育厅长了，但上海小組还和他保持一定的联系。由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名声，和我們党在初創时期的幼稚，还没有高度的鉴别能力，去选择真正的最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党的領袖，而讓陈独秀窃踞了党的总書記这样一个重要职务。

“五四”时期的名声和党初創时期的幼稚，沒有高度的鉴别能力，去选择自己的領袖，而讓陈独秀窃踞了总書記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一九二一年九月陈独秀就辞去了广东教育厅长的职位，回到了上海，专门担任党中央書記这个职位，从此以后在

我們党内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毛主席说过：“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同志們，我們听了毛主席这段話以后呀就不奇怪，在革命过程当中，有些人打着紅旗反紅旗，标榜自己信仰馬克思主义，那么由于我們党的初創时期的幼稚，还不善于識別党的領袖，讓陈独秀窃据了領導权，窃取了領導地位，也說明我們党要真正識別自己的政治領袖呀是不容易的，它有一个斗争和鉴别的过程。那么陈独秀当了党的总書記，并没有損于，也无損于我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的历史

的紅綫。党的历史的中心在毛主席一边，毛主席在六四年的时候曾經講过这么一段話：就是說，我們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領袖，五个朝代，叫五朝領袖。第一朝叫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法，实际上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洛甫就是張聞天。五朝領袖都沒有把我們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經驗。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也講过：在我們党的前几任領導人中，都是坏的，但是并不妨碍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第一任陈独秀是托派，是取消派。第二任瞿秋白，叛徒晚节不忠，最后仍被国民党杀掉。第三任是向忠法、李立三，向忠法是叛徒，李立三一直沒有改好。第四任王明，住在莫斯科，为苏修效劳。第五任張聞天，这个人呀，大家都知道的。这几个坏人无損于我們党的伟大、光荣，无損于

毛主席思想的紅綫，事實上我們通過上面兩條路綫鬥爭史的建黨路綫上的鬥爭，事實上正如林副主席所教導的：“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事實證明正是這樣，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毛主席建黨路綫建立起來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我們黨的历史中心和紅綫，是在毛主席這一邊，所以以上說明了三句話，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是中國革命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第三句話特別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建黨路綫，無產階級建黨路綫戰勝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綫；這樣的偉大成果。沒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不能建立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同志們可以看看世界上，目前的狀況

有些党象印度共产党，它是一九二二年建党的，到现在还在重建，说明建党的斗争是非常艰苦。而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呢，就能够战胜各种叛徒集团，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们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不断的胜利前进，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要看到毛主席怎么样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认识毛主席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世界上好多党都在重建嘛！经过四十多年，她还在摸索嘛！说明建党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有的党是两个党，有的是三个党，前面几个都变修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自己可以

真正信仰的領導。這是中國人民最值得庆幸的大事情。毛主席說過這麼兩句話：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煥然一新，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毛主席建黨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上面講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陳獨秀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第一個焦點，是在建黨路線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

第二個問題“關於革命領導權問題的鬥爭”。這個時期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當中第二個焦點，就是革命領導權問題上的鬥爭。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呢？這個是革命的關鍵問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同志們現在搞文化大革命，很明顯羅！但是要看到黨的幼年時期，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不是很清楚的。我們黨成立之

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党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就掀起了从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二·七”惨案，这时形成了高潮，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們党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因为斗争的需要，就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搞国共合作，建立統一战线，在統一战线里面，曾經批判了以張国燾为代表的“左”傾关门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又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线，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斗争是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出席了这个代表大会，批判了“左”右傾机会主义观点。毛主席当选为中央委員。那么在1924年的1月，孙中山先生他接受了我們的主張，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为孙中

山从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他已經灰心喪氣，处于絕望之中啦！辛亥革命之后，他想革命革不下去了，到上海寫書，他就在中山故居，香山路寫書了，算了，不革命了，不想下去了。后来呢，想想又不行，还是要革，革命嘛自己又沒有力量，結果跑到广东去依靠他的广东軍閥去搞革命。到了22年，他一个部下叫陈君民，孙中山依靠他的部下陈君民，原来就是个軍閥，結果就22年炮轟總統府，又把孙中山赶到中山艦上去了，又回到上海，后来广东又派軍閥又把他迎到广东去，又請他去了，当大元帅去了。原来当總統，后来当大元帅，后来呢又被人家赶出去，所以他在我們党成立前后，他是处在絕望之中，那么看到我們党，看到工人运动的掀起，他愿意跟我們合作，搞国共合作，所以在24年在广州就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

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工农，這樣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那麼我們黨就派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資格參加國民黨，同時保持我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同志們，我們注意這個時候的國民黨，它是國共合作是統一的形式，是我們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綫，這個範圍跟我們今天講的清隊呀，清隊範圍的國民黨，概念上有所不同。後來在“四·一二”以後，蔣介石叛變為反動派了。這個是國共合作。有些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資格參加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好多中央委員啊，還是共產黨員，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長還是共產黨員，勞工部長也是共產黨員。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呢，當過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是為了捍衛我們黨的統一戰綫領導權，堅持鬥爭。毛主席對於資產階級搞統

一戰綫的時候是堅持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是反對和批判陳獨秀的只聯合不鬥爭，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方針。由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那麼就在廣東成立了廣東革命政府，後來建立了黃埔軍校，統一了廣東全省。通過統一戰綫之後，為我們黨進行工农運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就有了根據地了。在這個期間發生了“五·卅”運動，上海發生了“五·卅”運動。在廣東發生了港九大罷工，所以這個是我們黨第二階段搞統一戰綫階段。第三個階段是領導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統一戰綫建立以後，就為領導農民運動開辟了一個門戶，特別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對於農民運動特別重視，農民問題是革命的中心問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早在1923年的時候，就領導了湖南衡山一帶的農民起來鬥爭；25年毛主席回

到韶山，就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农民协会。到了26年的下半年，就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高潮。在高潮情况下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就发动北伐，搞北伐战争，不到半年时间，就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就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因此就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局面，所以我们党的初期、中期路线是正确的，这个毛主席著作里面已经讲清楚了。初期、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经历了工人运动阶段，经历了统一战线阶段，经过了农民运动大发动的阶段。所以取得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也经历了工人运动，经历了统一战线，经历了农民运动。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工人运

动，毛主席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个同志们都知道的，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不是拍了个电影叫《燎原》为他树碑立传，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事实真相全部都揭开了，他是叛卖安源工人路矿罢工的胜利果实，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是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真正领导者。毛主席还领导了粤汉铁路、泥木工工罢工，和军阀赵恆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据历史的记载，当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毛主席领导泥木工人罢工的时候，坚持和赵恆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由于工人的愤怒声由于工人阶级斗争，使罢工得到胜利。所以事后，当时大公报的报纸上讲到赵恆惕的恐慌心里，他说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怒吼声，差一点把长沙的瓦片都飞走了。这说明了毛主席领导工人运动的声势多么大，反动派多么害怕，

这代表着最正确的方向。第二个统一战线，毛主席在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时候，是又联合又斗争，坚持我们党的领导权。坚持党的原则。毛主席经过“三大”之后，曾经回到上海，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这里面和国民党的右派进行斗争，和戴季陶啊，他就是上海执行部工作的。由于毛主席的斗争，敌人对毛主席非常害怕，也非常仇视。据反动派国民党右派他自己讲，这个毛泽东啊，他遇事力争，不肯稍微迁就。这是国民党口里自己讲出来的。就是毛主席遇事力争啊，什么事情力争，不肯稍微迁就，这是毛主席的高度原则精神。坚持我们党的领导权。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嘛。第三，农民运动，毛主席领导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去湖南考察的时候，刚好湖南长沙召开两个会。一个是工代会，一

个农代会。工人代表会和农民代表会。結果呢，工代会、农代会知道毛主席要到湖南考察农运了，就馬上打个电报請毛主席指导大会。这个电报怎么講呢？毛主席奔走革命，功勛卓著，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今天来湖南考察农运，本会特电請毛澤东先生来会指导一切。結果毛主席到了湖南以后，就对两个大会做了两次报告。一个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农民問題；一个是講統一战綫問題，后来蔡和森同志曾經在27年9月的时候，講到这么个情况，說1926年冬以来，毛主席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方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为一切人民之所欢迎。高度评价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敌人要反对，人民欢迎，毛主席在革命过程当中，曾經担任我們党中央农委書記，担任过全国农民运动講習所所长，到了1927年3

月，毛主席在武汉又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主席。在党内担任过党中央組織部长。所以毛主席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在羣众当中，享有极大的威信。他的革命活动，也是经历了工人运动，統一战綫，农民运动。代表我們党的正確方向，正確路綫。上面我們歌頌了毛主席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但是我們党的革命斗争，是不是平平安安的呢？不是的。随着革命和反革命斗争越来越尖銳，在統一战綫内部，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通过領導权的斗争活动越来越囂張了。那么階級斗争反映到我們党内来，就展开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綫在革命領導权問題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关于革命領導权的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綫它的分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資产階級的关系，无产

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關係；第二個是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關係；第三是對待武裝問題的武裝鬥爭問題。領導權的鬥爭表現在三個方面，所以這個時候毛主席曾經寫了一首詞，叫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首詞概括成這麼一句話，就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誰來主宰中國革命，誰來領導中國革命？那麼下面分別把情況向同志們講一講。一個，領導權鬥爭表現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關係問題上，誰領導誰？陳獨秀觀點，他一貫的觀點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要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那麼陳獨秀為什麼要提這個觀點呢？他有两个謬論，一個謬論，既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嘛，當然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嘛，無產階級不過是幫助資產階級打天下，等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了，資本主義發展了我們再去革資產階級的命。這是兩次

革命論，是反动的两次革命論。另一个观点，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它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资产阶级是领导，无产阶级是被领导。到了1926年9月，他为我们党写了一个世界三分扩大会议决议案。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动的纲领，就完整的提出来了。陈独秀开始的观点是倾向，到了26年9月的时候，他的路线就完全提出来了。他的路线内容有很多，我们用两句话来概括：处处压制工农群众，只责难不领导，步步投降资产阶级，只联合不斗争，因此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胜利高潮当中，就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就埋伏着一个导致革命失败的危机和危险；导致革命失败的逆流。因为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已经逐步逐步地形成了，在革命胜利，大革命的高潮里，就掩盖着、埋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危机和逆流。但是

在当时，我們党内的一些同志，还不認識，还不覺悟到这一点，而有些同志驕傲起来了。以为北伐軍打不到武汉了，旧軍閥已經快垮台了，革命要最后胜利了；忘記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忘記了国民党將要襲击我們。只有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綫剛剛冒头的时候，就和它作了針鋒相对的斗争。特別到了1926年3月，毛主席为了批判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就写了个《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这个同志們看到毛选第一篇，就開門見山的提出来了，“誰是我们的敌人？誰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提出来工业无产阶级是我們革命的领导力量。……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們的陣线。

那就是說同資產階級搞聯合，搞統一戰綫的時候呢，要又聯合又鬥爭，他們的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左翼可能是朋友，對這個朋友啊還不可靠，要時常提防他們。所以說當時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毛主席認為要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那麼同志們可以在學習階級分析這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到毛主席闡述的理由，主要是這樣：毛主席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區分兩部分，一個是買辦資產階級；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又區分為左翼和右翼，說成資產階級兩面性，有革命的一面，還有妥協的一面，當領導是不行的，這是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從分析工人階級的作用來看，工人階級是代表了新生的生產力的代表者，特別能戰鬥，而能戰鬥的原因呢，一個是集中；第二個是經濟地位低下，壓迫越深，反抗越大，他

是新生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所以最有远見，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第三个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当时的时代从整个世界来看，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已经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整个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嘛！是革命的敌人嘛！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嘛！不过因为民主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他有两面性，所以有一定时期参加革命啊。一定时期他要动摇。所以当领导不可能。所以毛主席在阶级分析里讲这个阶级或者向左跑入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做帝国主义的附庸，那里还有独立的事呢？根本不可能，所以毛主席阶级分析这篇文章不仅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第二个问题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

关系的問題上，毛主席認為，既要領導就有被領導，沒有被領導，領導權就是空話了。毛主席一向認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特別是貧下中農，是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同志們，這個問題啊，毛主席是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馬克思在當時的時候他提農民作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當時，德國的農民他不是援助無產階級的，他是援助資產階級，所以當時馬克思希望假如德國的無產階級得到德國農民的幫助的話，那麼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他就會獨唱變成合唱，他希望變為無產階級的後備軍。因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面嘛，農民還是追隨資產階級的。到了列寧的時代，列寧把農民作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軍，進一步闡明了工农聯盟的思想。而毛主席在這個時候，不僅把農民作為後備軍，作為同盟軍，而是作為革命的主力軍，

是最可靠的同盟軍，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来提出来的。这个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那么当时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就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农民大革命。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階級怕得要死，大講农民运动糟得很，就紛紛跑到城市里面来。那么国民党右派呢？資产階級呢？也跟了叫，大叫农民运动糟得很，結果汪精卫就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會議上，就来責备我們共产党，說共产党这样搞农民运动，要破坏統一战綫，要妨碍国民革命。北京軍閥的軍官呀，好多都是地主的家庭被冲击了，不安心了。那么陈独秀听到汪精卫在会上一叫，資产階級的代理人，他就是实行一党一羣的私利嘛，也大罵糟得很，就反对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反对农民运动，糟得很。所以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就在这样情况下面，为了

粉碎敌人的污蔑，批判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就在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到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用事实来回答。那么毛主席这篇文章，我们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和陈独秀机会主义对比来看。我们举几个方面来看，陈独秀曾经胡说“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毛主席在考察报告里曾鲜明地指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陈独秀是说农民保守呀，散漫，难以加入革命，毛主席是热情地歌颂了农民在中国革命当中的伟大作用。第二个，陈独秀呀，他说什么呢：“国民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便没有了阶级

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陈独秀在那里念念不忘的不忘资产阶级，失去了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阶级基础了。毛主席呢，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农民起来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仍是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陈独秀说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资产阶级。毛主席说，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两条路线，两种观点绝然相反。第三，陈独秀当时反对农民建立政权，他说不应该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的口号，就妄图让地主继续地统治农村，压迫农民。毛主席是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主张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个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农民有了政权，才

能取得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呀，这个革命斗争胜利的保证。第四，陈独秀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后面大罵貧农是“痞子”，“痞子运动”。毛主席极大的革命熱情歌頌，没有貧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第五点，陈独秀胡說：“农民运动太过火了”。嚇跑资产阶级，破坏統一战綫，糟得很。毛主席說：“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还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同志們，毛主席在这里就給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上綱上綫了，是反革命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嘛。同志們看一看，写阶级、考察报告，他就是针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写的，就是

批判粉碎階級敵人的污蔑，批判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說明黨內兩條路線、兩種觀點是多麼針鋒相對。毛主席在這篇文章裏面，系統地針鋒相對地痛斥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和階級敵人的污蔑，就解決了一個領導權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提出了要鞏固勝利、發展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呢，在當時大革命轟轟烈烈發展的情況下面，應該放手發動羣衆，放手發動農民，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所以毛主席在這篇文章裏面，曾經尖銳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來，是“站在他們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這是考驗一切黨派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試金石。所以毛主席這個農民問題，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作一個中心問題，作一個主力軍，最可靠的同盟

軍来看待的，作为解决领导权中心問題来看待的。在党的“七大”，毛主席曾經講过下面一段很生动的話，說明农民同盟軍的重要性。毛主席說：“中國人口五分之四的人民，是农民，就是说中国人五个人当中四个是农民。譬如说我们用五个指头打人，打敌人，说不得了，砍断了四个指头，剩下一个小指头，就是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剩下小资产阶级的話，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話，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孤立了，无产阶级总司令部沒有农民啊，就变成了“空軍”司令，农民不来，小资产阶级也不来，开小差了，这不能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呢，就是看你力量大不大，小资产阶级有时很凶，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呢他就屁滾尿流，当你剩下一个指头的时候，你向他说同志，来不来啊！他不来，他说有事，家里老婆生了病啦。这不能怪

小资产阶级，只能怪我们总司令手下没有兵，没有力量，只有我们总司令招兵买马了，聚众成了，我们用四个指头，即有五分之四的农民，就有了力量了，那他们就来了，你叫他来，他本来有事，他说没有事了，我老婆不生病了。小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力量一来，我们无产阶级总司令下面有兵了的时候，小资产阶级靠攏来了。”毛主席的这段话就说明了无产阶级怎么团结农民，依靠农民，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陈独秀这些家伙他就看不到这些，说资产阶级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农民保守，难以加入革命斗争。你不去领导嘛，领导没有被领导，领导不是成了空头了吗？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不理解，还不重视，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呢，又极力

地反对和压制农民运动，对农民的正义要求，他是采取拒绝的态度，反对的态度。农民伸出手来要东西，陈独秀泼给他一盆冷水。这就是站在地主阶级一面，不要农民嘛，还有什么反帝，还有什么反封建呢？所以农民问题啊，是当时解决领导权问题两条路线斗争的很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领导权斗争问题表现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无产阶级要不要掌握好和领导武装斗争呢？这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支柱问题。中国革命历史表明，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就应该有强大的军队。你看看，当时北洋军阀，一个叫馮系军阀張作霖，他手上有三十五万军队，他是控制东北、北京、天津；还有个军阀叫直系军阀叫吳佩孚，是镇压了“二七”罢工的吳佩孚，他是有二

十萬軍隊，他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還有一個軍閥叫孫傳芳，他也有二十萬軍隊，他是控制着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東南五個省，你要打，可你手上沒有武裝怎么行呢，這些北洋軍閥就是凭着手上的反革命武裝在各個帝國主義后台老板下面，竊踞一方稱王、稱霸。在城市里边，買辦資產階級，他往往也有自己的武裝，叫“商團”。地主階級的農村反革命武裝叫民團，說明革命的領導者不掌握武裝，怎么去推翻這些反革命武裝呢？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就我們黨應該自覺地成為革命戰爭的領導者。革命武裝的領導者。但當時作為黨的領導者來說，負責人的陳獨秀，怎么样對待這個問題的

呢？怎么样对待关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呢？陈独秀是否認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否認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一贯地忽視对军队争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一个中山艦事件，把第一军的軍权篡夺过去了，他不反击，后来又讓蒋介石篡夺了北伐軍总司令的职务，他也不反击。他为什么不反击呢？他有个观点：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帮他打天下，他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論”的观点出发。而毛主席当时呢，对蒋介石篡夺軍权，就提出了要反击。但是陈独秀不同意，后来毛主席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講習所。学员每天上軍事課，教导学员、农民的干部到各地去訪問农民武装，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毛主席用专门的一节写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所以毛主席对武装斗争一贯是非常重視

的，就在這個問題上和陈独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陈独秀他是一再反对武装农民，反对我们党武装革命，把革命武装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所以毛主席在考察报告里面，曾经尖锐指出：应该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应有一定的梭标，而不应该限制他，假如被这个梭标嚇坏了，那正是胆小鬼。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的观点里又讲到了这个问题，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通的日常真理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呢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就当时表现领导权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对资产阶级谁领导谁？第二个对农民要不要去掌握最主要的同盟军？第三对武装，我们共产党要不要去领

导？就在这样三个問題上，这三个問題构成了大革命时期，毛主席革命路綫和陈独秀投降路綫斗争的焦点，还是講到斗争的第二个焦点，是毛主席革命路綫和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綫的第二个焦点。

第三个問題，陈独秀叛徒集团的危害。陈独秀叛徒集团对资产阶级是退讓妥协，屈膝投降，对农民运动是压制反对。拋棄最可靠的同盟軍。对武装力量放棄领导权，反对武装工农羣众。这一种投降主义路綫，在1927年的上半年，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就占据了統治地位，完全排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这样，第一次的大革命失敗，終于不可避免。同志們，我們学习这段党的历史，党的初期，中期路綫是正确的，是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指导和斗争的結果。使大革命轟轟烈烈经历了工人运动，经历了統一战綫，经历了农民运

动，到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到了二七年下半年，到末期投降主义路线，这个投降主义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导致革命失败。所以三个时期，初期、中期、末期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他是逐步形成的，开始他是一个观点，后来是倾向，到后来形成一个路线，即使形成一个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个党中央机关占据统治地位还没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到了27年上半年，他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毛主席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的时候，深刻的指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得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所以这

次大革命为什么失敗呢？是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棄对于农民羣众，城市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的領導权，尤其是放棄武裝力量的領導权，使革命遭到了失敗，就是在目前形势和任务里面談到的問題。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危害很多，我們今天举四个方面的例子。最典型最可恥的表現在蔣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几个关键时刻，我們看看陈独秀叛徒集团的阻臉；四个关头，一个是呀重要关头；一个是叫紧急关头；一个是危急关头；一个是最后成敗关头。四个关头我一个一个講：一个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六月，大革命到了第一个重要关头，二六年七月是搞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前夜，蔣介石的国民党右派，他为了篡夺領導权，当时在統一战线内部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在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搞了一个中山艦事件，

中山艦的艦長叫李志龍，他當時是個共產黨員，又是代理海軍局的局長，那麼蔣介石呢就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山艦艦長李志龍，接着把中山艦開到黃埔，當中山艦到黃埔時候，蔣介石馬上造謠了，說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廣東革命政府。結果把李志龍等五十多個共產黨員逮捕起來，把以周總理為首的國民革命第一軍共產黨員也拘捕起來，排斥了共產黨對第一軍的領導權，這是第一個事情。第二個發生的什麼事情，整理黨務案，蔣介石在1926年5月15日，在國民黨的會議上，提出一個整理黨務案，什麼叫整理黨務案呢？就從今天開始，決議案通過為止，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不可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從此以後不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原來不是講中央組織部長、勞工部長、宣傳部長都是共產黨員，不好擔任了。共產黨

发指示給参加国民党里边的共产党员的时候，你这个指示，要給国民党看，就是要給蔣介石看，这是一个反共的決議案。毛主席对于蔣介石发动中山艦事件，发动整理党务案，提出了反击的方针，要迎头痛击。蔣介石当时他的翅膀还不硬力量还不小，完全可以反击。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者反对毛主席的主張，主張对蔣介石投降、退讓。而張国燾呢，当时担任我們的党团書記，国民党国共合作嘛，国共合作的會議上有党团書記，他是追隨陈独秀，也是对資产階級退讓。那么到了26年6月4日，陈独秀这个家伙，給蔣介石写了一封投降書，蔣介石已經发动了反动的反共“三·二〇”事件，中山艦事件了，或整理党务案，陈独秀这个叛徒写一封投降書，說什么呢，“事实上从建立黃浦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

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还胡說：“如果在广州阴谋打倒蔣，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的反革命。簡直是胡說八道，就是誰反蔣誰就是反革命。他說：“蔣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應該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取締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應該枪斃他，絲毫用不着客气。”簡直是无恥到极点，是叛变到何等程度！赤裸裸地暴露出叛徒的咀臉，所以同志們，我們看到了之后簡直是肺都要气炸了。这个公开信呀，是极为恶劣的，麻痺了我們的黨員，革命人民，对蔣介石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革命阴谋的警惕性，使我們黨員和羣众失去阶级警觉性。那还起什么作用呀！叛徒集团就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投降国民党右派，結果呢蔣介石从中山艦事

件，从整理党务案得到了好处，他找到了陈独秀这个代理人，他的活动就更加嚣张，和我们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活动就更加嚣张。因此，在北伐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让蒋介石窃据了北伐军总司令这样一个重要职务。第二，在1927年4月12日第二个关头，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革命到了紧要关头，蒋介石要发动“四一二”政变了。蒋介石那个总司令部在南昌，他从南昌一路杀到上海，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同志们去看一看，在结束语里面，已经公开点名批判蒋介石，说叶公好龙，就是点名批了蒋介石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咀脸，要全党提起警觉。但是陈独秀和汪精卫在四月五日就是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前的七天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就是汪精卫、陈独秀的联

合宣言，說蔣介石決沒有驅逐友党和摧殘工会的这个事情，繼續麻痺和解除党和人民的思想武裝，陈独秀拒絕做任何的对付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結果蔣介石来一个突然襲击，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宝山路上，我們工人階級血流成河，因为上海工人階級在1927年3月21日曾經举行了第三次武裝起义，胜利地占領了上海，表現了工人階級的雄伟力量。蔣介石从南昌一路杀到上海，要把我們工人階級的胜利果实夺走嘛！这个时候，就應該提高全党的階級警覺性。所以毛主席在考察报告里面，就点名批判了蔣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揭露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而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却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說蔣介石決沒有驅逐友党摧殘工会的事情，来麻痺革命人民的斗志。蔣介石利用这个机会，来搞突然襲击，发动

“四·一二”政变，使上海的工人阶级血流成河，人头落地。从此蒋介石这个新军阀就上台，几十万的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惨遭蒋介石的屠杀。所以陈独秀这个叛徒啊是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可耻的叛徒。第三个关头，是27年的“4·12”政变后，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提出了我们党应该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大力建立农民武装，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但是陈独秀在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不仅拒绝讨论毛主席的建议，并且无理地剥夺了毛主席的表决权，他利用家长制，利用他总书记这个职位这个权，权掌握在他手中嘛，无理剥夺了毛主席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表决权。把毛主席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毛主席在土地革命中赶快发动农民，巩固我们的

基础。陈独秀反对毛主席的英明建議，剝夺了毛主席的表决权，排斥了毛主席对大会的領導。所以在5月21日，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面，湖南有个軍閥叫做許克祥，就在长沙叛变革命，历史上叫做“馬日事变”。为什么叫“馬日事变”呢？就是电报代号是馬日，那么許克祥发动了政变，屠杀工农，当时在毛主席革命路綫指引下，湖南有十万农民武裝，在毛主席革命路綫指引下就包围了长沙城，許克祥当时只有一千人，我們十万农民武裝，完全可以把叛乱鎮压下去。就是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陈独秀派了李維汉去，怕引起整个政局的糾紛，下了一道命令，就是农民不得进城武裝斗争，湖南問題要等候国民政府来和平談判，来政治解决。人家拿起刀杀我們了，在屠杀工农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綫指引下，十万农民包围了长沙，完全可以鎮压

下去的时候呢，陈独秀这个叛徒就下了这样一道无耻的命令，要把农民全部撤回，撤回去啊，十万人顶一千人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结果呢，使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所以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子，对敌人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不杀他，他就杀你。结果在二十多天之内，长沙附近的工农群众啊一万多人，就被反动派屠杀了，把革命力量最雄厚的湖南丢掉了，决定了大革命的难免要最后失败。第四，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前夕。大革命到了决定成败的最后关头，毛主席为革命万分焦急，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步步贩卖的情景是万分气愤的。当时好多的农民，农民运动骨干，好多共产党员，都跑到武汉，跑到毛主席家里面，叙述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对于革命万分焦急，对陈独秀叛徒集团万分气愤。就

在6月25日当时蔡和森同志也跑到毛主席家里去，就共同写信給党中央常委，批評陈独秀。这封信里講什么呢？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軍閥的反动态度，既然已經如此明白，我們不能夠靜坐在这里呀，等待人家来处置呢。你坐在这里，好比魚游斧底，蔣介石从江西杀到上海，搞了一个“四·一二”政变，許克祥搞“馬日政变”鎮压了工农，汪精卫也叛变了，反动軍閥的态度已經如此明白了，我們怎么样可以靜坐这里等待人家来处置呢？好象魚放在鍋里燒一样，因此建議党中央和中央軍委，立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个軍事計劃，以防万一。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統治的这个叛徒集团，又拒絕了这个英明建議，使党錯过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机会。所以每个关头，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都起来作斗争，但由于这个投降主义者，在领导机关

佔居了統治地位，權在他們手裏面，他排斥反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使我們黨一次又一次地錯過了挽救革命的機會。到了革命成敗關頭的時候，最後成敗關頭，陳獨秀投降主義者拒絕了這個建議。不僅如此，陳獨秀還和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一起下令要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例如勞動童子團，木棍全部要收掉，為什麼呢？工人有武裝，小孩子手裏有木棍，怕引起整個政局的糾紛，怕破壞國共合作。到了這個時候還放這個謬論。這個叛徒劉少奇內奸、工賊劉少奇在這個時候追隨陳獨秀，伙同一起來破壞工农武裝，他們的叛徒咀臉暴露無遺。這樣在陳獨秀之流叛賣下面，汪精衛在寧可錯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面，就公開進行“七·一五”的反革命政變。7月15日公開進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在上海，汪精

卫在武汉，蒋介石叛变了，汪精卫也叛变了，大批屠杀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所以这一切说明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堕落成国民党反动派，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成为他们的工具和走卒。陈独秀叛徒集团，陈独秀之流，是一伙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鲜血的无产阶级的叛徒。陈独秀叛徒集团，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使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人头落地，真是罪恶滔天！这个陈独秀叛徒集团的危害，我们今天举了这样四个关键时刻，四个关头，在重要关头，他怎么样？在紧急关头，他怎么样？在危急关头又是怎么样？在最后成败的关头又怎么样？由于他步步退让，步步叛卖，断送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所以我们党的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还是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

里，是決定我們黨的命運。通過文化大革命，使我們更親切地了解這個問題。而我們學習黨內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兩條路線鬥爭史，我們要記住這個血的教訓。世界上各國共產黨有的變修了嘛，有的重建了嘛，就是領導權問題，這個權的問題嘛！黨權是權中之權嘛！掌握在誰手里，陳獨秀可以用家長制嘛，是呀，他有一個叛徒集團嘛！來控制這個東西，排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革命幾個關頭，叛賣革命，使革命失敗。這個講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陳獨秀叛徒集團的可恥下場和歷史教訓。失敗和挫折教育了我們黨和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1927年8月7日，黨中央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這個就是歷史上的“八·七”會議。毛主席出席了“八·七”會議。在會議上徹底批判和粉碎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

因為我們黨處於幼年時期，所以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危險，一時還沒有認識出來。那麼，現在歷史证明了嘛，陳獨秀失敗了嘛，受到歷史的懲罰了嘛！所以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批判了粉碎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會議就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結束了陳獨秀投降主義路線在我們黨內的統治。大會還根據毛主席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路線，確定了現在要搞土地革命，要武裝反抗國民黨，要搞秋收起義。會後毛主席就親自到湖南，領導了秋收起義，並且把工农的革命軍帶到井崗山，向井崗山進軍。就親手樹起了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建立農村根據地的大旗，就把我們黨重新撥正航向，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政權這樣的革命道路。井崗山就成了武裝鬥爭的集合點，革命政權的立足點，革

命胜利的出发点。在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领导向井冈山进军嘛，就成了武装斗争的集合点，革命政权的立足点，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把我们中国革命引向了更深入的阶段，引向土地革命阶段，历史就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面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就进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这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陈独秀叛徒集团的结果，是毛主席在革命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拨正了航向，使我们党又重新生气蓬勃地进行战斗，领导中国革命。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面讲过这么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是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那么陈独秀投降

主义者，他断送大革命，使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人头落地，这是极其严重的血的教训。但陈独秀这伙人，并没有真正改正错误，相反地顽固不化，坚持错误，越走越远。在革命遭到暂时挫折和失败的情况下，陈独秀这伙人就更加暴露了他们叛徒的真面目了。陈独秀从他的机会主义的两次革命失败，他胡说蒋介石、汪精卫上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呢，只好搞议会斗争了。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嘛！蒋介石、汪精卫上台了，我们中国还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那里有什么搞资产阶级啦，搞资本主义啦，那里还有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呢？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法西斯专政，新军阀的专政。它可不象英国和法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嘛，他却说是资产阶级胜利

了，因此就取消革命所以他逐步逐步地取消革命，并且他从自己害怕斗争，贪生怕死的叛徒哲学出发，和彭述之，还有一个叫汪德洁、馬玉富、蔡正德这一伙人勾结起来，成立一个取消革命的反党的秘密集团，陈独秀叛徒集团。集团还有些人罗，哪些人呢？彭述之、汪德洁、馬玉富、蔡正德这些人勾结起来，成立一个反党的秘密的小集团，来攻击党，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污蔑毛主席进军井冈山搞武装割据，是“流寇”，污蔑党，污蔑毛主席。这样在1929年11月，我们党就将陈独秀这伙叛徒驱逐出党，清除出党。事后陈独秀又把彭述之、郑超林、高玉汉组织一个所谓“无产者”，打着红旗反红旗，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发行所谓“无产者社”杂志，这个杂志叫“无产者”来攻击毛主席，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刘仁静也组织一个

所謂“十月社”，也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發行“十月雜誌”。一個姓黃的，叫黃元明，組織所謂“鬥爭社”，發行“鬥爭雜誌”。這些傢伙都封托洛斯基匪徒為首領，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就正式勾結成立了“托陳取消派”，托是托洛斯基，陳是陳獨秀。屬所謂中央機關的上海，發行“火花”雜誌，完全墮落為反革命小集團，就充當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卑鄙的工具；從此以後，陳獨秀叛徒集團與托洛斯基相勾結，參加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進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無恥勾當。1931年“9·18”事變之後，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這些匪徒，還奉托洛斯基的黑指示，叫不阻礙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這樣一個黑指示，墮落為漢奸，當漢奸去了。到了1932年10月，蔣介石反动派為了使陳獨秀這個反革命集團，更好地為他們服務，

把他梳裝打扮一番，結果曾經演過一付逮捕陳獨秀、彭述之十個人的這樣一個丑劇，為什麼要逮捕他呢？把他抓起來以後，使羣衆明了陳獨秀還在革命，不革命為什麼蔣介石還要抓他呢？造成這樣一個假象，那麼更好的爲國民黨特務機關服務，但是在逮捕陳獨秀的時候呢，陳獨秀、彭述之這些傢伙在法庭上繼續的公開地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中國工農紅軍。因此當時明眼人革命人民一眼就看穿了，這完全是國民黨的卑鄙的工具嘛，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集團嘛！這個叛徒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它人數是一小撮，而且內部是四分五裂。在1939年的時候，陳獨秀曾經寫一封信給托洛斯基，他在这封信里哀嘆呀，他說：“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我們在上海、香港兩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50個人，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

百人以上。”100个人，这是一小撮，而且内部游离分子很多，四分五裂。这真是毛主席在一首诗里讲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1942年，陈独秀死于四川江津，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历史早已宣判了陈独秀叛徒集团只不过是啮于人类的狗屎堆，早就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个是讲的陈独秀叛徒集团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变过去，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成了叛徒反革命集团的最后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下面再谈谈我们学习这一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历史给我们什么教训？我想初浅的谈三点体会，供同志们参考。

一条要认真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接受历史的教训，不断在斗争

中搞好整党建党，吐故納新，把我們的党建設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確。同志們可以学习《共产党人发刊詞》这篇光輝著作。毛主席在这篇著作里講了下面这段話，可以看到我們当时党的建設的状况，幼年时期的状况。毛主席这样講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綫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終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設三个基本問題上都没有經驗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

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沒有能夠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騙，而使革命遭到失敗。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組織是发展了，但是沒有巩固，沒有能夠使黨員、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詭計的包围中，但是沒有警觉性。党内湧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沒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还不善于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國革命的实践相結合。”所以《共产党人发刊詞》这段就是我們学习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看到我們党初期的幼年时期党的状况，党的第一时期的經驗，毛主席

的總結，向我們提出了要想正確地解決黨的建設問題，就必須貫徹正確的路綫，就是要在正確路綫指导下，不斷的斗争当中，整党建党，吐故納新。党内建設的根本問題，首先还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路綫教育，这个應該擺到首位，不光是組織上的吐故納新問題，同志們看到上面《共产党人发刊詞》里边，毛主席總結党的这一段历史經驗，不是告訴我們嗎？要使黨員、党的干部，在思想上坚定起来，不是告訴我們嗎？要提高階級警覺性，告訴我們，要善于識破階級敌人的陰謀詭計，要不受資產階級的欺騙，要把混入党內的投机分子清除出去，把积极分子組織起来，組成一个中堅骨干，这样子才能使我们党壯大起来，巩固起来。所以光有革命的积极性，沒有路綫斗争覺悟，失去正確的指導，我們党的

建設还是搞不好的。主席不是講过嗎？黨員、黨員羣众和党的干部革命积极性非常之高，所以形成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是缺乏路綫斗争的覺悟，階級警惕性不高，所以我們学习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接受这个教訓，要我們党建設得好，就是要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綫，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路綫来不断地在斗争中整党，要按照正確路綫来指导，光有革命积极性，沒有正確路綫来指导，我們的路綫，我們的整党还是搞不好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发出五十个字整党建党綱領，以及开門整党的最新指示，就是教导我們，在今天我們要搞好整党建党，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我們今天有了毛主席的直接領導，又了解了历史的經驗教訓，所以我們今天搞整党建党，就更要增強自覺性，去掉盲目性，要

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为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自觉地去参加去领导这个运动、这个斗争。要接受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训，光有积极性，但大批投机分子混进来了，没有清除出去，积极分子还没有组成中坚骨干，受了资产阶级欺骗，我们党处在敌人阴谋诡计的包围当中，还缺乏警觉性。在认识这些问题，还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但当时还是少数人，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陈独秀叛徒集团他占据领导机关，而广大党员积极性很高，但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还不够还不理解，所以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国民党搞突然袭击，陈独秀的叛卖，使革命遭到失败。

第二个问题，这个时期的历史教训还教育我们，无产阶级这些政党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因为这是党的性质，党的

政治綱領決定了的，這是中國革命人民委託給我們的重任，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毛主席說過，“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象陳獨秀。陳獨秀對於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採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干淨。”過去陳獨秀不懂得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對資產階級只聯合不鬥爭，放棄領導權，搞投降主義，使革命遭到失敗。後來王明叛徒集團、劉少奇叛徒集團他是追隨陳獨秀，也搞投降主義，投降國民黨反动派、也使我黨遭到損害。所以說是黨的權、革命政權、領導權必須牢牢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手里，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這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毛主席發出了號召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無產階級

必須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領域，对資產階級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是时代賦予我們工人階級的光荣使命。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們要全面实行无產階級专政嘛，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嘛！在民主革命当中，有一个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爭奪領導权的斗争。在今天呢仍然还存在无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权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刘少奇叛徒集团篡夺的权夺回来嘛！这不是領導权的斗争嗎？在今天我們打倒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階級敌人不甘心失敗嘛，他們还要跟我們爭奪，还要翻案，还要出現新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嘛，所以还仍然存在爭奪領導权的斗争。联系到我們三办系統，这个斗争就更明确了，还是存在一个非常尖銳的无产

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我們就是要爭奪這個領導權，把一切權力統統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所以我們要通过第一次大革命這個歷史經驗，看到陳獨秀叛徒集團的危害，看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正確。就是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要及时了解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象毛主席講的，要有階級警覺性，光有革命積極性還是不夠的。用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來武裝自己。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我們工人階級要不畏艱險，不怕困難，堅定自覺地去領導上層建築的鬥批改，去占領一切陣地，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才是我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員應該有的徹底革命的精神和階級本色。這是時代，是黨是人民賦予我們的責任，這是歷史上血的教訓。千萬不能

放棄領導，越是艱險越向前。應該把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

第三，第一次大革命歷史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我們要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實際行動，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在《學習和時局》里面，講到這段話：“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所以歷史的教訓決不要忘記，第一次大革命的經驗深深教育了我們，當革命在前進的時候，革命是怎樣勝利的发展；當革命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時候，由右傾機會主義篡奪了領導權，革命是如何遭到挫折和失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因此我們學習兩條路線鬥爭

史，千条教訓，万条經驗，归根到底，就是要自覺地学习和掌握毛澤东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而在今天的环境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离开了繼續革命，就是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所以我們要接受历史上的教訓，戒驕戒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繼續革命，那么才能进一步理解、貫徹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你离开了繼續革命，就不能夠进一步理解、貫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也只有懂得历史經驗，懂得了毛主席革命路綫的伟大，看到了修正主义路綫的危害，才能使錯誤路綫，錯誤傾向剛剛冒头的时候，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羣众的批判和抵制。所以毛主席講：“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个路綫，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給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

知道。” 什麼道理呢？就是說，只有懂得黨的历史，懂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懂得機會主義路綫的危害，才能使錯誤路綫、錯誤傾向剛剛冒頭的時候，就受到廣大黨員批判和抵制。保證我們黨始終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確航道勝利前進。所以說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我們要戒驕戒躁，要接受歷史上的教訓。1927年上半年，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了，自以為不得了，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綫的錯誤，使革命歸於失敗。是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啊！這是歷史的教訓，歷史的結論，也是現實的結論。我們的黨經過了血的教訓，才認識到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無比正確。革命先輩和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為我們創造了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學習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極好條件，這是我們這一代的幸

福。所以我們通过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学习第一阶段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我們一定要珍惜这一点，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革命，不断地前进，把我們斗批改领导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革命的领导，没有共产党不行。第一军周恩来，第二军项增正，第三军李富春，第四军朱培德，第五军朱德，第六军朱德，第七军朱德，第八军朱德，第九军朱德，第十军朱德，第十一军朱德，第十二军朱德，第十三军朱德，第十四军朱德，第十五军朱德，第十六军朱德，第十七军朱德，第十八军朱德，第十九军朱德，第二十军朱德，第二十一军朱德，第二十二军朱德，第二十三军朱德，第二十四军朱德，第二十五军朱德，第二十六军朱德，第二十七军朱德，第二十八军朱德，第二十九军朱德，第三十军朱德，第三十一军朱德，第三十二军朱德，第三十三军朱德，第三十四军朱德，第三十五军朱德，第三十六军朱德，第三十七军朱德，第三十八军朱德，第三十九军朱德，第四十军朱德，第四十一军朱德，第四十二军朱德，第四十三军朱德，第四十四军朱德，第四十五军朱德，第四十六军朱德，第四十七军朱德，第四十八军朱德，第四十九军朱德，第五十军朱德，第五十一军朱德，第五十二军朱德，第五十三军朱德，第五十四军朱德，第五十五军朱德，第五十六军朱德，第五十七军朱德，第五十八军朱德，第五十九军朱德，第六十军朱德，第六十一军朱德，第六十二军朱德，第六十三军朱德，第六十四军朱德，第六十五军朱德，第六十六军朱德，第六十七军朱德，第六十八军朱德，第六十九军朱德，第七十军朱德，第七十一军朱德，第七十二军朱德，第七十三军朱德，第七十四军朱德，第七十五军朱德，第七十六军朱德，第七十七军朱德，第七十八军朱德，第七十九军朱德，第八十军朱德，第八十一军朱德，第八十二军朱德，第八十三军朱德，第八十四军朱德，第八十五军朱德，第八十六军朱德，第八十七军朱德，第八十八军朱德，第八十九军朱德，第九十军朱德，第九十一军朱德，第九十二军朱德，第九十三军朱德，第九十四军朱德，第九十五军朱德，第九十六军朱德，第九十七军朱德，第九十八军朱德，第九十九军朱德，第一百军朱德。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第二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 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

(录音稿未經本人审阅)

同志们：

今天我来参加学习班，和同志们一起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由于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得好，发言中肯定会有不少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王明叛徒集团是危害党最大的三大叛徒集团之一。这个叛徒集团以王明为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共四年时间里，窃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端严重的损失。到了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窃取了党的长江局书记的职务，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又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王明何许人也？所谓“二十八个半”又是怎么回事？先向同志们揭露一下：

王明，又名陈绍禹，安徽人。是个老牌修正主义、大叛国贼、苏修特务。一九二五年混入党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一月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真是十恶不

赦，死有余辜。后来他几次出国，回国。从一九五六年起即以“养病”为名，飞往苏联，卖国求荣，他在苏修面前低头哈腰，干了许多罪恶勾当。一九六二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王明正式叛国投敌，与苏修一唱一和，大肆反华，最近几年，他还用馬馬維奇等俄文化名，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恶毒攻击、污蔑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堕落成为不齒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謂“二十八个半”是王明等一伙人在莫斯科学习期間，就已形成的反党宗派集团，他們自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維克”，簡称“二十八个半”。王明是这个叛党宗派集团的总头目，集团的主要成員：王明、張聞天、楊尚昆、孙冶芳、孟庆树、博古、殷鉴、陈昌浩、郭紹棠、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章汉夫、

王稼祥、沈泽民、王盛荣、曾秀夫、張琴秋、潘汉年等。“二十八个半”的称号是怎样来的呢？是这样的：斯大林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培养中国干部，于一九二五年創辦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变革命后改为中国劳动大学），当时王明、博古、張聞天、楊尚昆、王稼祥等在那里学习，他們因为“能說会道”受到了学校领导人布哈林分子米夫的器重，叫他們这伙人窃取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王明等这伙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受到学校里大多数人的反对。有一次两派，一派就是王明派，一派就是反对派，在辯論关于总支委员会解散所屬团支部的問題在表决时，王明这一伙人支持总支委员会方面意見的一共站出二十九个人，其中一个叫徐以新，只有十六岁，个子特別矮小，观点也有些搖擺，动搖于

兩派之間只能算半個。因此反對派稱他們是“二十八个半”，（實際上這一派後來發展到四十多人）。後來王明等就接過了這稱號。無恥地自稱為二十八个半布爾什維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這就是“二十八个半”反黨集團的由來。從一九二九年九月開始，這個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相繼回國，以王明為首，篡奪了黨的領導權，瘋狂地反對和排擠毛主席，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康生同志曾經指出：“二十八个半沒有一個好的”。王明和他的集團中的一些人，其中有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叛徒，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有反革命分子，有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國際間諜。有些人甚至到解放以後還干了一系列破壞我國革命事業的反革命勾當，真是十惡不赦的。“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偉大領袖毛主席領

导全党同王明叛徒集团进行了自始至終的坚决的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王明路线作了尖锐地、反复地斗争，终于战胜了他們，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下面来談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圍繞着哪些問題进行斗争的？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給党造成怎样严重的危险？党是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分四个問題來說。

一、革命形势，革命性質問題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統治遭到了失敗，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蔣介石建立了反革命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軍閥代替旧軍閥。对工农阶级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比以前更加

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丝毫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蒋介石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的大屠杀，他们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妄图把革命人民吓倒、杀绝。这时，全国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混乱，有一些投机分子退出了我们党，又有一些人堕落为叛徒，充当了国民党的走狗，做出了出卖阶级利益的罪恶勾当。但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要继续战斗，首先要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保持马列主义的清醒头脑，

要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革命性質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这是引导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首要环节。在当时这样紧要的革命关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认为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但是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革命性質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是《井冈山斗争》中，有一段关于革命性質和形势的问题英明论述，毛主席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按：即民主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

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轉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按：即民族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在这最高指示里，毛主席指明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是处于低潮，但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毛主席又科学地规定了

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對形勢估量正確，就可以克服右的悲觀失望和“左”的盲動主義，革命性質問題認識正確，革命任務、革命對象、革命動力、打倒誰、依靠誰、團結誰等問題才不至于搞錯。毛主席在這裡規定了當時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階級、軍閥政府。革命的動力主要是工人、農民，還有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兩個階段的區別和聯繫，毛主席也作了規定。這些革命根本問題上的鬥爭，就是路線鬥爭。姚文元同志在上次六月十七日《講話》中講到：所謂路線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是說革命的目的、性質、對象、任務、依靠什麼人、團結什麼人、打擊什麼人、如何對待自己、如何對待同盟者、如何對待敵人。

毛主席对当时革命形势、革命性质的分析，就是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斗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流，都反对毛主席的看法，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事业已“死亡”！这完全是反动话，反动的叫嚣；因此，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后来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瞿秋白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否认失败和低潮），他为什么这样看？因为他只看支流不去看主流。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不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断革命”，混淆革命的两个阶段，一混淆，革命的政策、策略都要错了。因而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这几个月中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瞿秋白

等人早在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會議上就有“左”傾机会主义思潮露头。“八·七”會議是瞿秋白主持召开的，这次會議成績是主要的，結束了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路綫对党的統治，这是这次會議的成績。但在反对右的傾向的同时出現“左”的傾向。瞿秋白等人在痛恨蔣介石的屠杀和陈独秀的錯誤的同时，痛恨是对的，但是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由于头脑发熱，不能冷靜地分析形势和革命性質，产生了盲动主义思潮。所以在“九大”文献中說：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傾向，这是历史經驗的总结。“八·七”會議上瞿秋白窃取了党中央書記职务，会后不久就不顧敌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后的羣众情緒，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羣众在全国組織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这就叫盲动主义，它給革

命带来了不少損失。这是第一次“左”傾路綫。由于这次錯誤路綫一开始就受到毛主席的批判和抵制，所以推行了几个月的時間就基本結束了。

李立三也是錯誤地估計革命形勢、混淆革命性質的，也給革命造成損失。在1930年，他看到当时不断的軍閥战争（1930年5月至10月，发生了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有一次大战）和紅軍运动有了一些初步发展，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等有利革命的条件，就驕傲起来，对于一些不利条件、不利因素他看不到。譬如說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們的力量，敌人強大，比較起来我們还是弱小的，这一点他也看不到，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这个他也不認識。所以他得出一个錯誤的結論認為：“羣众要大干”，“不要小干”，認為已經具备了在全国“大干”（城市武裝起

义)的形势和条件。認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轉变的开始。由于他对革命形势估計錯誤,就在紅軍还幼小的时代,命令紅軍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裝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幻想几个城市一暴动,一、二个大城市打下来,就是全国性革命取得胜利了。他还胡說什麼:中国革命一胜利,世界也可以馬上胜利。这也是盲动主义,又一次給革命带来危害。他犯了1930年6月至1930年9月第二次“左”傾机会主义路綫的錯誤。毛主席同立三路綫作了坚决的斗争,搞了三、四个月就結束了这次錯誤路綫。

毛主席的这次革命路綫战胜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次“左”傾机会主义路綫,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傾机会主义路綫之后,一九三〇年九月前后,

王明叛徒集团的一些主要成员陆续从苏联回国，他们非但不接受前两次“左”倾路线的历史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以“国际代表”的招牌和“钦差大臣”自居，又玩弄反党的宗派阴谋，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上台的。再加上党内一些“左”倾思潮没有肃清，利用党内长期留存的“左倾”思潮，王明正式上台。通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流毒全党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大毒草，提出新的更“左”的政治纲领，是极左极左的纲领，完全反毛泽东思想的。他通过了这个报告就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使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党。

第三次“左”倾路线比前两次更有“理论”，气焰更盛，统治党的时间更长（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达四年之久），对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危

害也很大。

王明一伙反对毛主席对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的指示，他们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夸大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抹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要求党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采取“打倒一切”的过“左”政策。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在打倒之列。王明叛徒集团上台不久，由于王明对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作了这样错误的分析，因此在两个问题上对革命造成了损失，一个是1931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出现了有利革命的形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极其广泛的抗日浪潮。毛主席立即英明地指出：“在新的形势面前，党应当联合一切抗日势力和军

队，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組成抗日反蔣的统一战綫，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王明叛徒集团却提出了錯誤的口号，叫做“保卫苏联”，因为他們把日本侵略中国看作是为了进攻苏联，所以提出了这个口号，他們把主要的打击力量对准中間派別，即民族資产階級和上层小資产階級，这正如毛主席在《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光輝著作中所指出的：“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費彈藥。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

“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由于王明叛徒集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錯誤地估計革命形势和混淆革命性質，使党沒有能夠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出現的有利形势，丧失了发展革命的大好时机。

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的十九路军的负责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26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毛主席指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是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但是，王明

叛徒集团完全反对毛澤东思想，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在1933年12月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書》，其中說：“福建人民政府”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的空話之外，并沒有任何真正反帝反封建的实际行动；它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都是反革命派騙人的把戏，其目的正是为了維持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統治，为了要阻止中国人民的革命化。由于王明叛徒集团拒絕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打倒一切”的政策，使蔣介石在打敗十九路軍之后，又集中全力来繼續进攻紅軍。

由于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質問題上王明叛徒集团完全違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丧失了有利革命的形势，使党不能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这就对

中国革命造成了損失。

二、革命道路問題上的两条路綫斗争。

由于革命形势、革命性質問題上的两条路綫的斗争，带来了革命道路問題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当时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左”傾路綫的“城市中心論”，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1927年革命失敗后，伟大領袖毛主席根据对革命形势、革命性質的科学分析，給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农村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

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放棄了革命的領導权，党应当从失敗中

吸取教訓，党应当独立地領導革命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党应当在羣众基础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同国民党进行針鋒相对的武装斗争。

“八·七”會議之后，毛主席回到湖南，1927年9月9日，毛主席亲自在湘、鄂、贛边界地区領導工人（就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农民（江西、湖南交界地方一些农民）和北伐軍一部分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工农革命軍，向敌人发动了进攻。起义軍原定攻打长沙的計劃沒有实现，毛主席就指出来：长沙虽然好，但不是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革命力量要退出城市，轉移到反革命力量比較薄弱的农村去，使革命力量走上武装割据农村，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

道路。起义后，毛主席就率领部队向湘赣边境的井冈山地区进发。途中在江西永新县，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十月到达井冈山区域，击退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军队的几次“进剿”，建立和恢复了地方党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开始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叫井冈山根据地。

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把正确的退却和正确的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城市的革命失败了，我们要退却，当然应该退却，这个退却是正确的，是需要的。退却到哪里去？应该退到农村里去，农村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革命的力量比较强，有农民可以发动，应该这样做。城市里革命失败了，我们应该进攻。向哪里进攻？不应再向城市进攻，像瞿秋白他

們說的那樣。應該向農村里進攻，我們向這個地方進攻，我們可以在那里生根、開花，可以壯大我們的力量，將來再打城市。它開始了把黨的工作重點从城市轉移到農村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和道路。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井崗山地区的割据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工农政权）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广，紅軍和赤卫軍一天一天壯大，1928年4月，林彪等同志率領的一支部队到达井崗山，这支部队就是南昌起义留下来的，和毛主席的部队胜利会师。五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紅軍第四軍，毛主席任党代表，不久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专门指导打仗，領導党、紅軍，地方工作），作为边界党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机关。由毛主席任前委書記。六月成立了湘贛边界工农民主政府。1929年1月

至3月，毛主席率領紅軍進軍贛南和閩西，开辟了贛南和閩西两个革命根据地。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主席又写了《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崗山的斗争》、《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从理論上說明了必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而且指出：建立农村根据地，扩大紅軍，扩大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条件下是完全可能的。說明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許多帝国主义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紅軍、游击队和紅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階級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結。

果”。在这里，毛主席指出了农民問題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反帝反封建的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斗争的領導，是中国无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中国的农民斗争有了无产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会有紅軍、游击队和紅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必然的形式，必然的結果，而且必然要成为促进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左”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錯誤之一，就是沒有認識农民問題的重要性；他們更不懂无产階級怎样去領導农民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向什么方向发展，因而不可能促进中国革命，毛主席又指出：“……單純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有根据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

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須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須这样，才能給反动派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須这样，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須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在这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設的总的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把农民发动起来，用武装把一个地区占领下来，这叫做武装割据，成为我們的根据地，成为紅色政权。这个工农武装割据，包括三个方面的思想：一、土地革命的思想；二、武装斗争的思想；三、建設根据地的思想。把这三个思想拧成一股繩，加上无产阶级领导，这就是工农武装

割据，这三个东西是缺一不可的，不搞土地革命就没有办法把农民发动起来，就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不能建立根据地。只有搞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那么农民就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参军、给粮食，就来干革命，所以土地革命是少不了的，武装斗争也是少不了的，不搞武装斗争，怎么搞土地革命？地主有武装，国民党有武装。只有武装，建立我们的武装，扩大我们的武装，在农民里发展我们的武装，那么土地革命才能有保证，根据地才有保证。蒋介石不断地要来消灭我们的革命力量，消灭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没有红军，没有农民游击队，那么根据地就站不住脚，土地革命就没有办法搞。所以武装斗争，武装是很重要的。根据地也很重要，没有根据地那么你就流来流去、搞流动的游击战争，

土地革命也沒有办法搞，今天分了明天又被地主武裝占領了。根据地沒有武裝也沒有办法发展，武裝力量也不能扩大，一定要建設根据地。根据地有了，就可以站住脚，站住脚就可以搞土地革命，可以搞武裝斗争，可以搞政权建設，可以联系人民羣众，这样革命力量才能一天天壮大。这三者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沒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沒有武裝，土地革命就沒有保证。沒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和武裝斗争都会失去依靠。“工农武裝割据”的思想，是創造紅軍、建立和发展紅色政权，促进革命高潮必须具备的思想。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叛徒集团就是完全沒有这个思想。他們不愿做艰苦地、細致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想用巩固、扩大农村根据地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工作，而希望在城市搞搞罢工，搞

搞起义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主席指出这种思想“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又指出：“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周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毛主席对悲观论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批评和回答。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的伟大意义，不仅为中国革命指引了胜利的方向和道路，即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农村积蓄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而且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

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地实际意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革命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前后，根据地发展到十五个遍及十几个省，造成了逐步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的形势。有了这样一条路子，我们才能使蒋介石感到困难，他消灭不了我们，且看到我们力量一天天壮大，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全国革命人民来讲呢？是一个信心，有信心。咳！红色政权是能够站住脚的，红色政权是能够发展的，红色政权一定要胜利的。所以毛主席说：建立一个红色政权，可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敌人感到动摇，国民党士兵看了红色政权一天天的扩大，感到打下去没有路子走还是投降，投降红

軍，這是一條路。毛主席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完全必要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可行的，行得通的。這些理論都是毛主席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了。馬列主義只告訴我們，要革命，要奪取政權，這是馬列主義講到的。但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要奪取政權，這個路怎么走？這個馬列主義沒有這樣講，這是毛主席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毛主席制定了這一條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許多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這樣一個國家里軍閥的戰爭是不斷地發生的，我們革命可以利用軍閥之間的混戰，來發展我們的力量。在許多軍閥管不到的地區，我們革命力量可以生根開花，這是毛主席發現的。」那些「左」傾主義者光是把馬列主義者的一些理論、一些詞句，光是從字面上來理解，搬得來，蘇聯是搞城

市武裝起義的，我們中國也要搞城市武裝起義，這就是教條主義，違背毛澤東思想的。蘇聯是城市里工人罷工搞城市武裝暴動的，中國也是這樣搞，那就和中國的情況不符合。所以“左”傾是教條主義；他不是象毛主席那樣把馬列主義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毛主席的偉大，毛主席的英明，就在於把馬列主義，正確地運用到中國來，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的道路，把中國革命從失敗引向勝利，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這樣偉大，就是這樣英明，這樣正確。

但是，幾次“左”傾路線都違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以瞿秋白為代表的第一次“左”傾路線，主張“使暴動的城市”成為農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因此，他把主要的希望寄托於大城市的武裝起

义；曾經使大革命失敗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繼續受到損失。

李立三惡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胡說什麼“决不能有什么‘割据’的局面，……想‘以农村来包围城市’，……是一种幻想，是一种絕對錯誤的觀念。”他污蔑毛澤东思想是“农民意識的地方觀念与保守觀念”。这完全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主張什么呢？主張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他的錯誤口号是：“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他还將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級領導机关，合并为准备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裝起义的各級行动委員會，使一切日常工作停頓。結果，凡是实行立三路綫的地方，都使党的力量受到損失。

王明叛徒集团非但不接受瞿秋白、李立三路綫教訓，而且頑固地坚持以城市为

中心，他們污蔑毛主席的革命道路是“山沟里的馬列主义”。意思是說：山里是沒有馬列主义的，只有他們的教条主义那一套才是馬列主义。这真是胡說八道！你們这伙人，搞的不是馬列主义，馬列主义應該是同本国具体情况相結合的，离开了本国的情况，离开了具体条件，离开了具体的分析根本不叫做馬列主义，这叫做教条主义，这叫做修正主义。毛主席搞的把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主要的原則，运用到中国来，在山区里面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真正的馬列主义。馬列主义就是能夠在山沟里創立起来，就是能夠在山沟里发展起来。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空講大道理，不是教条，对革命有理，能夠引导革命从失敗走向胜利，这就是馬列主义，这就是毛澤东思想。王明搞的那一套东西，正如毛主席

所批判的：“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王明叛徒集團熱衷於城市武裝起義，強調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他們提出“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鬥爭”的錯誤口號。并把奪取中心城市放在議事日程的首位，他們經常不顧條件，搞盲動主義的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罷崗、罷操，舉行飛行集會等。1931年5月，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通過了一個《目前的政治形勢及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案。其中說：“中央特別號召幾個中心城市的黨部，如上海、南京、香港、廈門、青島、天津、唐山、北京、太原、奉天等地，……在發動“五卅”運動中，要利用各種羣眾集會的場所，去舉行飛行集會，……要反對說飛行集會都是立三路線的繼續。或採取投機取巧的方

法，二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上海某区），这都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和逃跑主义，党必须予以坚决的斗争。”这种决议和做法真是“左”得出奇！很明显，飞行集会是立三路线的翻版，却不允许人家说这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他们要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五卅”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在当天就说你是投机取巧。给你戴上“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王明叛徒集团完全同毛主席的思想背道而驰。毛主席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

固的根据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盲动主义恰恰是在力量不夠的时候和強大的敌人硬拚，而且是在強大的敌人所占据的中心城市和敌人硬拚，这样的做法，那有不造成革命事业严重損失的呢？由于王明叛徒集团在革命道路問題上違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結果，就使党的白区工作几乎損失百分之百。

三、軍事路綫問題上的两条路綫斗争。

怎样建軍建党？怎样打仗？在这个問題上毛主席的无产階級軍事路綫和王明的資产階級軍事路綫也有两条路綫的斗争。毛主席主張用无产階級思想建軍建党，实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王明路綫用資产阶

級軍事路綫建軍建黨，實行正規戰陣地戰。毛主席在秋收起義中親自創立了中國工农紅軍、“三灣改編”，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連隊以上各級都設黨代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主席還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綫作了不調和的鬥爭。1929年7月中旬在福建新泉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就是毛主席的軍事路綫同以紅四軍軍長兼軍委書記朱德及紅四軍的另一個主要負責人陳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綫進行大鬥爭的大會。兩條路綫鬥爭的根本分歧表現在對形勢和任務的分析、紅軍的建軍路綫、黨和軍隊的關係、軍隊和地方的關係、紅軍的戰略戰術等一系列根本原則上。這次大會由於種種原因（例如軍內一部份同志對政治局勢認識不清，資產階級軍事路綫在紅四軍中有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等），使錯誤路綫占

了統治地位，迫使毛主席離開了領導崗位。(会后，毛主席離開紅軍到地方養病，兼做地方工作。)

1929年9月在福建上杭召開的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發展到高峰的一次會議。當時一部份同志對此表示不滿，有幾十個支部聯名寫信要求毛主席復職。毛主席復信說明，政治問題不搞清，路線問題不弄清，不能隨便復職。表現了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

在錯誤軍事路線的領導下，紅四軍連續遭受了嚴重損失，證明了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破產。黨中央也指出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是正確的，並請毛主席重新回到紅四軍任前委書記。毛主席於1929年11月26日回到前委復職。12月，在毛主席親自主持和領導下，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

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会。大会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决议的一部份。毛主席对于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作了彻底的清算，规定了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的建设要突出政治，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党建军，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决不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的建党建军思想，使得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红军，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

軍隊。这样，紅軍就成为一支无比坚强的、战无不胜的軍隊，在保卫和扩大建設农村根据地的战争、工作中起了伟大的作用。

毛主席不但指明了如何建軍建党的問題，而且解决了紅軍怎样打仗的問題，規定了紅軍必須实行游击战的战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攏。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攏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林彪同志把上述战术概括成四句話，

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这就是說，你依靠現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覺悟的人民羣众；你發揮你的优势，我發揮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讓你吃掉我。打得贏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贏硬打是冒險主义。我們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 打的 条件 之下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这是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羣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發揮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

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們，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終在我們手里。

由于紅軍是毛主席的建軍建党思想武裝起来的人民軍隊，又实行了人民战争，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因此，在1930年冬至1931年秋之間，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第一次蔣介石是十万人，我們是四万；第二次蔣介石是三十万，我們是三万；第三次蔣介石部队还是三十万，我們是三至四万，这个都是用少数来打多数。我們的装备也沒有他們好，他們有飞机大炮，我們是小米加步枪。由于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打垮了敌人的一、二、三次进攻。比如第一次来講，进攻我們的儿路軍当中，超先了一路，这一路力量最薄弱，人数占十万人哩，只不过是一万多人，而且一万多人也分两路。

毛主席集中我們的优势，打它一路，只有九千人。从整个來說，我人数比你少，但我集中我的力量打你的一路，我的人数比你多。而且毛主席挑选作战的地方也是一个羣众条件最好的地方，叫做东固。彻底的打垮了敌人，抓了他們的头头。然后放了，他就逃了，他逃我們就追，这样就把敌人打垮了。王明叛徒集团瘋狂反对毛主席的軍事路綫，推行他們的資产階級軍事路綫，在紅軍中实行單純軍事观点，盲动主义，而且瘋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游击战術。

1932年8月，王明叛徒集团統治的中央在江西宁都举行會議，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在會議上否定了毛主席所規定并且已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完全证明了的正確的軍事路綫，推行了錯誤的軍事路綫，并将毛主席排挤出紅軍的領導地位。但是由于毛主席的战略战術在紅

軍中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掌握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和“左”倾路线的战略战术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所以从1932年6月至1933年2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取得了胜利。1933年初，由于王明叛徒集团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百分之百的被破坏，“左”倾领导的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左”倾路线就直接贯彻到红军里去了。他们排挤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直接将错误的战略战术贯彻到红军中去。1933年10月，蒋介石的一百万兵力，配备二百架飞机，请了德国的军事顾问来包围江西根据地，采用“堡垒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按毛主席的打法，仍然是游击战术，你用乌龟壳来包围我，我就突破你乌龟壳的包

围打到你的后头去，使得你不得不調兵去保卫你的后方，應該这样，这就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左”傾怎样呢？他采取了完全違反毛主席打仗的方法，他开始实行冒險主义，什么意思呢？把敌人的力量估計得很低，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得很高，叫得很响，是过“左”的口号。他說：現在蔣介石的部队已經是偏师，意思是蔣介石的軍隊現在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應該是帝国主义，就亲自出馬才叫主力軍，我打打你的偏师也可以，他說我們現在是国家与国家的战争。那时我們才成立工农民主政府。我們同你打是殖民道路和革命道路、人民的道路，两条道路决定胜敗的斗争。而現在的实际形势是敌強我弱，这个形势是存在的。从发展的观点講，我們是能夠打敗他們的。但現在不能硬拚，硬拚就是盲动主义。完全違反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把游

击战污蔑为“游击主义”；提出一套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他們胡說：誘敵深入是不对的，放棄了許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过去不同了嗎？并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敌区或在交界地区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嗎？过去的东西沒有任何的正規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現在我們的国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大軍和大軍作战。这样，王明叛徒集团就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第一阶段犯了进攻中的冒險主义的錯誤，主張“御敌于国門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

“不打爛罐罐罐罐”，“全綫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这种主張完全是違反毛澤东思想的过“左”口号，反对誘敌深入。毛主席說：“关于丧失土地的問題，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 才能 不丧失，这是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王明叛徒集團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這個後面要講到。在打了几次敗仗之後，他們畏敵如虎，在第二階段犯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的錯誤，主張“分兵把口”，“節節抵禦”，

“以堡壘對堡壘”。這時，毛主席主張紅軍主力殺出江西，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把它消滅。這就是要把消極防禦變為積極防禦。但王明叛徒集團拒絕毛主席的正確意見，正如毛主席所批判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界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王明叛徒集團採取了消極防禦的錯誤方針，其結果使根據地逐漸縮小，紅軍遭到了嚴重的損

失。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至1934年10月到了完全山穷水尽的地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开始，由于“左”倾分子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1934年11、12月间中央红军与重重封锁的敌人在广西金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一周，虽然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一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时约为八万人）。

以上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叛徒集团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分歧。在革命形势、性质问题上；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在军事路线问题上。

由于王明叛徒集团疯狂反对、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意孤行地

推行他們的“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在統治党四年的時間中，給中国革命造成了怎样严重的損失呢？結果，是喪失了除陝甘寧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紅軍由三十万人降到了三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黨員降到了三万黨員。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組織几乎全部喪失。按毛主席的話說：“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懲罰。

四、党是怎样战胜王明“左”傾机会主义路綫的？

“左”傾路綫的失敗已經在广大党员和紅軍中引起了怀疑和不滿，1935年1月，紅軍強渡烏江，13日占領貴州北部的重要城鎮遵义。为了挽救正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国革命事业，在毛主席的努力下，我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會議，即在我党历史上具有特殊伟大意义的

遵义會議。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左”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會議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確立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從此，我黨我軍就在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在極端艱險的情況下，取得了長征的光輝勝利，保存和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打下了基礎。

以上談的是我黨怎樣戰勝王明叛徒集團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

五、我們黨怎樣戰勝王明叛徒集團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作為“左”

傾机会主义代表的王明叛徒集团，在抗日战争初期走向另一极端，成了右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的代表。王明一伙用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綫和一系列极右的政策，来反对毛主席的正確路綫和政策。为什么忽“左”忽右？这是資产階級世界觀的反映，他們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为看問題上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他們的政治傾向，容易左右搖擺，忽“左”忽右。

1937年“七七”蘆沟桥事变发生，接着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全中国人民在伟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开始了抗日战争。7月23日毛主席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針、办法和前途》一文。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綫斗争，只有实行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全国人民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綫，反对

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路线，抗日战争才能胜利。实行我党的路线，

“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国民党的路线，“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八月，毛主席为党的洛川会议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一方面，批评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片面抗战，一方面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又具体规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作斗争。毛主席为什么提出这些主张？即以全面抗战来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要我党在敌后独立

自主地进行革命活动，因为毛主席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认为国共虽然合作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不会变的，必须对他们提高阶级警惕性，加强戒备。1937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并警告全党，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1937年12月，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并窃取了中央长江局书

記的职务。当时党中央下面設长江局、东南局(書記項英)、华北局(書記楊尚坤)。会后王明到武汉，把武汉地区变成独立王国。不久(12·27)又公开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提出一整套投降主义路綫，对抗毛主席的正確路綫。

王明对国民党蔣介石只講合作，不講斗争，只講統一战綫，不講独立自主。他反对我党领导抗日統一战綫，主張由統一政府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切由蔣介石国民党领导，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战綫”錯誤口号，他主張把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軍交給蔣介石，由他“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战計劃”。他反对在敌后放手发动羣众、实行人民战争、努力扩大解放区。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謬論。这是不講階級和階級斗争，丧失共产党员最起码

的原則。

毛主席为了同以王明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綫作斗争，于1938年10月至11月，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彻底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綫，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綫。在会上，毛主席针对王明路綫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尖锐地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毛主席再次号召全党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王明所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阎锡山，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

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毛主席在《戰爭和戰略問題》的結論中，強調指出：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又說：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

六屆六中全會，徹底批判了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38年10月25日，中央決定撤銷長江局和王明的長江局書記的職務。

這裡舉兩個對比的例子說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危害：

一個例子是陝甘寧邊區要不要留兵的

問題。毛主席主張應留一個師的兵力至少留一個旅來防守。王明、博古等認為不應再強調國民黨反動的一面。為了團結抗戰，八路軍要全部出動，後方不留兵，以表示對國民黨的信任。當時蔣介石正想鼓動我們部隊都開往前綫，而他準備以十萬兵力占領陝甘寧邊區。

一個例子是皖南事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項英忠實執行了王明路綫，造成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失敗和損失。1941年1月7日，當向北移動的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萬餘人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村地區時，遭到了預先埋伏的八萬多國民黨軍隊的突然襲擊。項英事先既喪失了警惕，臨時又張惶失措，雖然廣大指戰員英勇奮戰，但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千餘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俘。

由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戰勝了王明叛

徒集团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保证。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里，对抗日战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毛主席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陈独秀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汉。0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们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林彪同志說：“我們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澤东思想，我們的党就受挫折，就失敗，紧跟毛主席，照毛澤东思想办事，我們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們要永远記住这个經驗。”

命=次右"似"对读

⑤ 集中各山红军进攻中央根据地。红二、四、六、八、十军组成一军团。由朱德、陈毅率领进攻湘南。红五、七、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军组成二军团。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进攻湘东。红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

第三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 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一)

(录音稿，未經本人审阅)

一、刘少奇是隱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伟大的功勋，就是查出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原来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

毛主席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是毛澤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同志們都看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組的审查报告和罪证，一定引起极大的义憤。对于这样一个罪惡滔天的叛徒、內奸、工賊怎能不引起我們的憤怒呢？虽然大家都了解这些材料，但是在講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时候，我們認為必須从这个问题講起。因为只有清楚了刘少奇的来历，了解刘少奇是个什么东西，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处处反对革命、破坏革命，才能了解他抛出的一系列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綫的目的是什么。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又“左”又右，他实質是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或“左”或右，反右是以极“左”面目出現。

刘少奇混入党內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滿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階級、买办阶

級思想的異己分子。

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长期受剝削階級教育。一九二一年混进留俄預备班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进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莫斯科混入中国共产党。他混入党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滿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买办階級思想的異己分子。就在他混入党的那一年（1921年），他写給他的把兄弟一首黑詩，詩中有两句話：“一生富貴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它的意思是：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追求富貴荣华，貪图享受，應該及时行乐。这首黑詩，是刘少奇麤爛透頂的剝削階級丑惡灵魂的真情流露，最能說明刘少奇混入党內的时候，就不是为了革命的，而是来搞政治投机的。因而，在革命紧急关头，他就必然要妥协、投降、叛卖。果然，不久

他就投降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并与他们勾结起来，成为埋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刘少奇混入党内以后，很长一段時間搞工运工作。过去刘少奇的一伙也吹捧他，他自己也以“工人运动的模范”自居，拍电影等。一九二二年九月到一九二五年，他在安源路矿，窃据了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的职务，一九二五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窃取了全国总工会付委员长的职务。会后他到上海，又窃取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总务部付主任，或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之类）。一九二六年十月又到武汉窃取了湖北总工会秘书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夏，窃取了满州省委書記。一九三〇年夏到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第五次大会。会后留职工国际工作。一年后回国在上海党中央职工部工作。党中央机关撤

到苏区后，他还做了一段职工会工作。在这十年多点时间里，他一貫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追随陈独秀、王明，干尽了叛卖的勾当，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号的大工賊。可是长期来他竟厚顏无耻地吹嘘自己是“工人运动領袖”，真是无耻之极！現在从几件大的事件上看看他的叛卖罪行：

（一）刘少奇是出卖安源工人运动的大工賊。大家知道，安源的工人运动是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毛主席从一九二一年秋开始，多次到安源，每一次都給安源工人极大的教育、极大的帮助、极大的鼓舞。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安源工人运动的烈火轟轟烈烈地燃燒起来了。毛主席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真正創始人和領導者。而刘少奇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工人大罢工前几天才到

在的版的虛
目
二
一
安源的。他一到安源，就伙同李立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千方百计地反对工人罢工。当工人冲破他的阻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起来罢工，在罢工中他就压，他一反二压三出卖。压，要工人安分守己，他和资本家谈判。后来工人把谈判大楼包围起来了，逼着资本家签字，取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綫的胜利。可是后来刘少奇在总结“安源工运”的报告中，他又貪天功为己有，把一切功劳記在他自己的帳上。后来（1923年7月）刘少奇又和帝国主义（安源路矿所屬汉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勾結起来，签订了完全出卖工人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七条协約。規定工人要遵守资本家所訂的“規則”，要工人提高产量，加紧替资本家卖命，还規定工人不得“动輒罢工”等等。后来，竟至充当帝国主义和

資本家的幫凶，开除几个工人領袖，因为这几个工人領袖不听他的話，起来造他的反。他在安源期間，一边出卖工人运动，一边还写許多文章打着陈独秀一样腔調大罵工人階級“幼稚”。刘少奇在安源的所言所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賊，是个帝国主义、資本家的走狗。

(二)刘少奇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工賊。一九二五年五月，刘少奇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工人反帝斗争高漲（五卅大罢工），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英、日帝国主义軍閥和买办展开了空前的階級大搏斗。刘少奇一到上海就拚命压制和破坏工人运动，一面写文章命令工人“不要有法外的行动”。一面和买办資产階級勾結一起，將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爱国同胞捐獻給罢工工人的三百多万元的捐款全部交給买办資产階級所控制的总商会，扣

发这些捐款，造成工人生活上的困难。使工人的反帝斗争遭到极大困难。刘少奇甚至将罢工工人名单也交给了总商会，这等于交了黑名单，以至使大批被开除、被逮捕、被杀害。刘少奇是出卖上海工人反帝斗争的大工贼，他的双手沾满了我们阶级兄弟的鲜血，而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时，刘少奇嚇破了胆，丢下了上海的工人阶级，抱住狗头，私自逃到了湖南长沙。

（三）刘少奇在长沙、武汉、东北的三次大叛卖。刘少奇从上海溜到湖南长沙后，被军阀赵恒惕抓去，他在军阀的血腥政策面前，嚇破了胆，完全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从狗洞里爬了出来，他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离开湖南到广州。刘少奇到了广州后重新鑽进党内，随北伐军到了武汉，就窃取了湖北总工会秘书长。这

时他又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結起来，进行了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成为汪精卫派到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内奸），还向汪精卫交出了工人糾察队的全部武装。交枪后一星期，汪精卫就发动了反革命“七·一五”政变。这次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九年李立三又派刘少奇到东北去当滿州省委書記。到奉天（沈阳）不满一个月又被奉系軍閥張学良逮捕，当天晚上他就全部出卖了地下党组织，使东北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一次一次的大叛卖，刘少奇对党犯下了滔天罪行（因为大家都看过中央专案审查小組的审查报告和罪证，我就不詳細說了）。我想提出在他的几次叛变中，大家要注意他的几句自供状，当刘少奇在武汉充当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汪精卫对刘少奇說：“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內好，不要暴露。”陈公博对刘

少奇說：“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很清楚，刘少奇是阶级敌人派在党内的一個內奸。刘少奇馬上給汪精卫回文說：“我要千方百計地使共产党走失敗路綫”。“建議政府（指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鎮压与策反相結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即叛变的意思），从內部破坏共产党；建議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羣众，削弱共产党对羣众的影响”。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还有一句是刘少奇在滿州被捕时向敌人献策將他釋放，說什麼如果他能重新鑽到党内来，就可以“收集共产党的情报”，刘少奇这三句自供状，供出了刘少奇是敌人派进党内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是混在党内的大特务，是长期隱藏在党内的大反革命分子。这三句話自供状也供出了他混在党内进行破坏的总目的和总方針。只要抓住这一条，我們

就容易理解刘少奇以后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仅从以上刘少奇的这些罪行来看，完全说明他是一个埋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样一个大反革命揪了出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白区工作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所谓白区工作，就是党的革命根据地（称苏区为红色区域）之外敌人占领区党所领导所开展的群众革命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的工作（即沦陷区的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历来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一九四

三年前大部分時間在白區)，他在白區工作路線完全追隨陳獨秀、王明機會主義路線，忽“左”忽右，主要是右，“左”的時候也是形“左”實右。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三七年〔當時竊取北方局書記36--38〕，拋出大量關於白區工作的黑貨，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現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少奇的機會主義路線主要分歧分兩點來講。

(一)以白區工作為主還是以蘇區工作為主。這實質上是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認為，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农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因此黨的工作應以蘇區為主，羣眾工作和武裝鬥爭，又是武裝鬥爭為主。白區工作應配合蘇區，白區的羣眾鬥爭應該配

合武裝斗爭。

一切“左”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特別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綫，他們只要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裝暴动，不要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裝斗爭，他們認為白区工作为主，所以他們都是“白区工作論”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左”傾机会主义路綫时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議會可以利用，无組織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爭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主席还說：“在中国，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

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 and 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毛主席这两段话，把这些问题关系讲得非常非常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势是武装斗争，主要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刘少奇在这方面是完全追随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鼓吹“白区中心论”。他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唐山矿工的总罢工》一文中说什么“没有产业中心城市工人的巨大、顽强的罢工斗争与武装暴动，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援助白区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已经得着解放的每一个苏区工人与劳苦群众无条件的责任。”意思就是没有大城市的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他的话也是很露骨的，就是要走中心城市的工人武装暴动的道路，是要白区为

主，要苏区的农民羣众配合白区工人的斗争，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但是，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产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抛出《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反“左”为幌子，继续鼓吹“白区中心论”，说什么“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这就是继续坚持错误路线，顽固地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表现。

(二)是革命的斗争策略，还是右倾投降主义。这就是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面总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论政策》和《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主席的这一策略方针是积

极的。是以积极斗争为前提，以配合战争为目的。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一月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

“党在大城市中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間接地配合战争的……。”

毛主席的这一个策略方针是与刘少奇机会主义相对立的，是党在白区工作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方针。刘少奇机会主义路线不敢进行斗争，提倡什么“合法斗争”，

“经济斗争”，实际上是取消革命。但是过去胡乔木吹捧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說刘少奇规定“利用合

法”、“积蓄力量”等等方针，說这个就是毛主席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有机”十六字方针，是一致的。这样就欺騙了許多人，实际上这是完全对立的兩条路綫。那么刘少奇推行的“合法主义”、“經濟主义”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对立在什么地方呢？

1. 毛主席也講过合法斗争，但毛主席指的是革命的斗争策略。刘少奇推行的是修正主义的“合法主义”。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大肆鼓吹“合法斗争”。胡說什么“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是“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这是美化国民党，“我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毛主席講的合法和刘少奇講的合法有什么区别？毛主席講的是斗争策略，是与刘少奇鼓吹的合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毛主席說：

在白区“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須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許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毛主席这里說的，利用合法是針對“左”傾盲动主义講的。“左”傾机会主义，可以利用的他也不利用，他不搞合法斗争，也不要积蓄力量，不愿搞长期斗争，只知盲目蛮干。毛主席这里說的利用合法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是为了在斗争中揭露敌人，争取羣众，更快地积聚力量，最后配合革命战争，夺取政权。而刘少奇則是害怕革命，对于敌人的瘋狂镇压怕得要死。他的所謂“合法斗争”就是根本不敢触动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根毫毛，根本不敢进行非法的武装斗争。而离开了武装斗争来講“合法斗争”，就是修正主义的“合法主义”，只能是取消革

命斗争。事实上刘少奇干的完全是破坏革命，取消革命的活动。他在一九三六年窃取北方局的書記时，根本没有什么大的羣众政治斗争，却搞叛变活动，就是证明。

2. 毛主席講經濟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刘少奇鼓吹的是修正主义的經濟主义。刘少奇在一九二六年时就說什么“今后职工运动方針，应作各种經濟斗争”，“經濟斗争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說什么“工会为工人羣众之經濟組織”，他講不是工人羣众爭取解放，爭取工人利益的政治的一个組織。到一九三六年还这样說“党的任务就是忠实地为达到羣众的經濟要求而进行斗争”，大肆宣揚經濟主义。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問題》中指出，不論白区和解放区的一切組織和斗争都是为了战争的。毛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詞》中

又指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毛主席的指示很明确，一切斗争包括经济斗争要为政治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都是政治斗争。所以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而刘少奇是反对政治斗争，甚至到疯狂的地步，他在《论组织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的毒草中叫嚣“不可一味为政治任务而斗争”大家听，这是一句什么话？这不是赤裸裸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工贼面目吗？我们知道一切新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用所谓“经济斗争”反对政治斗争，用经济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工贼刘少奇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白区工作中推行其“经济主义”的黑货，实质上就是用经济斗争取消政治斗争。而且在解放以后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也极力推行反革命經濟主义，腐蝕瓦解工人阶級队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流毒极广，必須繼續肃清，进行两条路綫的斗争。

三、党的建設問題上的两条路綫斗争。党的建設問題，是关系革命成敗的最根本問題。

在党的建設問題上，始終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分歧，存在着两条路綫的斗争，我們的党就是在两条路綫斗争中发展、巩固和壯大起来的。党的建設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党的建設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毛主席革命路綫战胜“左”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的过程。我想在这里按照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詞》里說的“建設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

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一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这三方面来談党的建設問題上的两条路綫的斗争。

(一)思想上建党的两条路綫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在思想上建党就是要用无产階級的世界觀去改造黨員中的非无产階級思想，就是要对黨員进行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教育，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水平。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綫就是要用資产階級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来改造党，腐蝕党。这就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綫。

伟大領袖毛主席一貫重視对黨員的馬列主义教育，毛主席在率領紅軍长征到达陝北以后，就用极大的力量对党內进行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抓党的建設。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主席写的

《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光輝著作，就是用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從思想根源上、哲學觀點上來清算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來不及在全黨進行深入的学习運動。一九三八年十月，黨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在清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同時，對黨的建設作了重要的指示，對黨員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毛主席指出：“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鬥爭的武器，從兩方面反對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了。”要用馬列主義批判“左”右傾機會主義。毛主席這時又進一步對黨員進行路線鬥爭的教

育，提高黨員的路綫斗争覺悟。这篇光輝著作，从思想上武裝了广大黨員，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主席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詞》这一光輝著作，提出了“建設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維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全面地、系統地、科学地总结了党成立后十八年的党的建設經驗，对黨員进一步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教育，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刘少奇为了篡党，他抛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黑貨，妄图从思想上腐蝕黨員，使党蜕化变質。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紧活动，把自己裝扮成一个“党的建設理論家”。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經過长期地、精心地准备，背着毛主席，在延安馬列学院抛出了大毒

草《修养》，大放其孔孟之道，“公私溶化論”的毒計，要黨員閉門“修养”，越“养”越“修”。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他拋出了《做一个好黨員，建設一个好的党》的大毒草，繼續販賣他在黑《修养》中的“公私溶化論”“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謬論。一九四一年六月他又拋出《人的階級性》的大毒草，實際上是歪曲了人的階級性，抹殺人的階級性。不到一個月，他又拋出《論党内斗争》，實質他是要反对党内斗争，取消党内斗争。鼓吹“党内和平論”，同年，又拋出《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养》，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大肆鼓吹“馴服工具論”。他拋出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腐蝕黨員，要我們党變質。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綫，在思想上来說，就是用資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

思想来改造党。集中起来就是黑“六論”，即“階級斗争熄灭論”、“馴服工具論”、“羣众落后論”、“入党做官論”、“党内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亏占大便宜”）。

林副主席指出，刘少奇散布黑“六論”，“就是妄图腐蝕和瓦解我們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四二年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关于思想上建党的重大发展，是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斗争。毛主席在党内开始整风运动中写了《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快地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

次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运动，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开始后，刘少奇还极力破坏，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刘少奇在新四军三师营以上干部会上作整风动员时，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却胡说什么“整风是因为我们一些党员党性不纯，政治修养不够，纪律松弛，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你们要很好地加强政治、党性和人道主义的修养”，根本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企图用黑修养来抵制整风运动，反对整风运动。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伟大的整风运动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取得伟大的胜利。整风运动是党的重大的思想建设，为党的“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政治上建党的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們：党的建設是“同党的政治路綫密切地联系着”的，当党的政治路綫是正確的时候，“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維克化就前进一步”，当党的政治路綫錯誤的时候，“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維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使革命达到胜利的一条完全正確的政治路綫。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泡制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綫，这两条路綫的斗争是十分尖銳的。

但是，刘少奇却采取两面派手法或者裝扮出一付“正確路綫代表”的姿态，实际上搞他的一套机会主义路綫。或者他采取掩盖政治本質的办法，閉口不談政治，在不問政治的口号下 販賣 他的私貨。黑《修养》就是这样一個代表作。

黑《修养》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七

月，是刘少奇担任中原局書記期間，回延安时在馬列学院作的报告。这是一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当时抗日战争开始只有两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奋起投入民族战争，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国民党推行的投降分裂活动搞反共高潮，正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刘少奇抛出的黑《修养》，竟然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洋洋五万言；又长又臭的黑文章中，竟连“抗日救国”的字眼都找不到，不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吗？你们看，要把共产党员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在国民党大搞投降分裂活动、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他也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根本没有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不是明显暴露了他是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吗？这本书也闭口不谈武装夺

取政权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空談什么“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須經過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沒有这种斗争，就沒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可是他却不談怎样“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怎么能得到呢？不就成为空想了嗎？可見他談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假的，是騙人的。他的真正的目的却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話中，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明显地暴露了他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这本书还大談什么孔孟之道，大談做人处事的封建哲学，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他的恶毒用心是要把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

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总之，这本黑《修养》是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澤东思想的大毒草。正因为是这样一株大毒草，所以刘少奇要再版三版大肆推銷他的黑貨，大造反革命輿論。

为了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論》这部伟大著作。毛主席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黑《修养》只是在一些場合中听到一些刘少奇的謬論，毛主席就針對这些謬論进行批駁。后来刘少奇在检查时說，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論》是批判我的，批判王明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論》这部伟大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統地總結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經驗，揭示了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的規律，粉碎

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并且指出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这一伟大著作，同刘少奇的黑《修养》针锋相对，一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紧接着就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主席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这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明确地规定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步骤，彻底粉碎了王明、刘少奇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

机会主义路綫。中国革命正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从胜利走向胜利，我們的党也在革命斗争中，在党内两条路綫的斗争中发展和壯大起来。

(三)組織上建党的两条路綫斗争

組織上如何建党，这与政治路綫有密切联系的。因为組織路綫是为政治路綫服务的，怎么样的政治路綫就有怎么样的組織路綫。正確的政治路綫，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綫来保证。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刘少奇“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資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綫。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綫服务的組織路綫。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納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資派，他們隱瞞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狽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

央到地方許多單位的領導權，組成了一個地下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林副主席的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了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

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制定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也為黨制定了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這就是發展、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為了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共產黨必須擴大自己的組織，向着真誠革命、信仰黨的主義、擁護黨的政策、并願意服從紀律、努力工作的廣大工人農民和青年積極分子開門，使黨成為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毛主席接着指出：“大膽地發展黨是我們已經確定了的方針。但是在同時，又不可因為大膽發展而疏忽對於奸細分子和投機

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对于混入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敌人和不忠实的分子“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毛主席的这些英明指示，为我党在组织上发展、巩固、纯洁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保证我党的健康发展。

刘少奇为了贯彻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三六年他一到北方局（他任书记）就急急忙忙搞招降纳叛，拼凑黑班底。

叫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从国民党的监牢中叛变出来，排除革命的同志；当时柯老（柯庆施）就在北方局，刘少奇去了以后不到两年，就把柯老排除北方局。柯老开始是北方局书记，后来被排挤出去。因为当时柯老反对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为了拼凑黑班子，就提拔彭真等人。在当时的情况，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在北平的军阀宋哲元就与蒋介石有矛盾。如果我们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是完全有可能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但刘少奇不去搞斗争而采取叛变投降的路线。他勾结张闻天，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下达黑指示，叫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向国民党投降，“履行反共自首手续”，并且允许他们在报上公开发表极其反动的“反共启示”。

是极其反动的。当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在獄中就展开了一场斗争，一部分革命同志坚决抵制，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的革命的气节。但是，薄一波等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黑“指示”就成了他们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些叛徒就无耻地从狗洞里爬了出来。刘少奇立即把薄一波派到山西軍閥閻錫山那里去当官。又指使一批人从閻錫山的监牢里叛变出来，这批家伙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都受到刘少奇的重用，其中有不少人又重新混入党内。一九三八年冬，刘少奇被調任中原局書記（“皖南事变”后为华中局書記），这一时期中他繼續搞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綫。安插和重用饒漱石、譚震林、黃克誠、陈丕显、曹荻秋、叶飞等一帮子叛徒、特务、反党分子，成为独立王国。全国解放以后，这批叛徒

一个个飞黄騰达，被刘少奇安插到各重要崗位上，控制了中央的不少部門，‘安子文当了組織部长，彭真当了北京的市委書記和市长等等。刘少奇就是用这些人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階級司令部。刘少奇的招降納叛路綫，就是为了篡党，为了實現他破坏革命，复辟資本主义服务的。刘少奇上台也是靠陈独秀和王明上台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刘少奇在“五大”当了中央委員，因为“五大”毛主席被排除在领导之外，被剝夺了表决权，就在这个会上，刘少奇被陈独秀看中了，因为刘执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綫。刘少奇后来又怎么样当上政治局的委員呢？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当了政治局委員。当时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路綫占統治的那一次。他們之間是有关系的，他本身就是叛徒集团中的一

个。

刘少奇为了贯彻他的招降纳叛路线，还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他散布“在必要时还要放弃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的谬论。我们为了党的工作牺牲，而他要那样做。一九四四年他又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叛徒“不准重新入党”的指示，在《关于建党中的几个问题》的黑报告中，大讲叛徒哲学，胡说自首过的人“可以入党”，如果“自首分子一律不入党”“不好”，说不要叛徒入党“要利用自首过的人就不可能”等等，为这些叛徒制造合法的理论根据。

刘少奇这个叛徒集团为了隐瞒他们的罪恶历史，是要尽阴谋，费尽心机的。他们隐瞒得住时则极力隐瞒，如果隐瞒不住，则制造种种“理由”极力包庇伪造历史。一九三七年七月，刘少奇就盗用中央

組織部名义，发出《关于自首分子的决定》，说什么“送到自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續，或填一般反共自愿書，才能出獄，如他們曾經組織允許填写这类文件出獄的，得恢复其組織。”竭力包庇叛徒。整风运动期間，发现了延安有一批叛徒，就开展了审干运动，这批叛徒着了慌，急忙統一口徑，訂立攻守同盟。大叛徒薄一波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把叛徒名单交給当时窃踞中央組織部副部长的彭真，彭真按照刘少奇的所謂“保密”黑指示，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长期隱瞞。刘少奇还在审干运动結束时作了《关于建党中几个問題》的黑报告，为叛徒辯護。到党的“七大”时，刘少奇甚至想尽办法企图將“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也可以做中央委員”的話塞进党章，后因康生同志发现并坚决反对，这一阴謀才沒有得逞。

他們還利用兩面派的手法，對上瞞着毛主席，對下說“這是組織營救出獄”，中央已經知道，已經做了結論。甚至說這是組織秘密，你們不能知道。真是卑鄙透頂。

這批叛徒，就是用了這種卑鄙的手段，被長期隱瞞下來。

這裡還要講一下劉少奇一貫善于使用兩面派手法，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劉少奇許多事都是偷偷摸摸，背着毛主席干的。在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中，也往往以“擁護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的姿態出現。撈政治資本迷惑了不少人。但是他並不從正確的方面來反對錯誤路線，而是從極“左”來反右，從右來反“左”，比如他對白區工作的許多謬論，就是以反對“左”傾路線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一套右傾投降主義的東西。到“七大”時，

他看到毛主席在全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就表面上装得很拥护毛主席的样子，被他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逐渐爬上了更高的地位。刘少奇真是一个反革命老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是假的就是假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把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挖了出来，把这个叛徒集团挖了出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党的组织路线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要搞好清队工作，把混入党内的坏人洗刷出来。

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七大”召开前为止的十年时间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胜利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大大提高。于是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到六月二十一日，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論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我党领导八年抗战和二十四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經驗，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綫，并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綫。大会通过了以毛澤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党章。这次大会达到了全党在毛澤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毛主席在閉幕詞（即《愚公移山》）中說的“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是毛主席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是毛澤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綫的彻底破产。

大会以后，我党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政权問題上的两条路綫斗争。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本質，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斗争的集中点，始終是一个政权問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綫的斗争，也集中表現在这个問題上。

毛主席一貫教导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今年的选举》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維持他們的政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又在《战争和战略問題》这一光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決問題。”

早在一九二三年，刘少奇跟随陈独秀惡毒污蔑攻击无产阶级，胡說“夺取政权

以中国現在的形势来看，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說不上馬上拿来实行，这是很远的事，也用不着說很多的話来討論它。”

明目張胆地反对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夺取政权。

一九三九年，刘少奇又抛出黑《修养》，閉口不談抗日战争，不談武裝夺取政权，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政权問題就更加尖銳地提到党的面前来了。当时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领导广大人民与凶惡的日本侵略者作了浴血奋战，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軍和几乎全部的伪軍，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日本侵略者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抗击的，抗战的胜利果实理應該是人民所得。但是美蔣反动派不肯。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作为它独立的

殖民地。蔣介石在抗战期間消极抗战，放棄了大片国土，讓日本侵略者占領，他自己跑到重庆去。但是他却积极反共，保存了大量军队和用美式武器装备了几十万军队，就是为了消灭共产党，妄图独霸中国天下。因此抗战胜利后，他們一定要搶占胜利果实。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就发生了中国走什么道路？建什么国的問題。是坚决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为党的“七大”所通过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綫呢？还是把抗战胜利果实拱手讓給国民党，走旧中国的老路呢？这个問題是十分尖銳地擺在我們党的面前。

抗战一胜利，美帝国主义就用空軍和海軍帮蔣介石运兵去搶夺抗日胜利的果实。

抗日戰爭一勝利，毛主席就作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著作。在這個報告中，毛主席指出中國存在着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鬥爭。他說：“從整個形式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願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當時蔣介石還打電報給我們，叫我們不動，不准我們接受大城市。劉少奇就主張不動。毛主席主張能夠走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打過去，特別是東北。所以當時東北的大城市都是我們占領的。毛主席還深刻地分析了美蔣反動派的本質，指出蔣介石

“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革命紧要关头，给我们指明革命的正确航向，确定了正确的方针。

正在这个时候，美蒋反动派发现要把他们的反动军队运到敌占大城市，要作内战的部署还需要时间，于是又使出反革命两手玩弄“和谈”阴谋，乘机加紧内战准备，准备占领大城市。人民对蒋介石认识不清，对美帝的本质不认识。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毛主席不顾艰险，亲自率领代表团到重庆谈判。党内许多同志不让他去。毛主席到重庆后，有不少的革命的民主人士也劝主席马上回去，不要在重庆，有危险。

刘少奇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面跳了出来，他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毛主席是

八月二十八日赴重庆，八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延安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綱領。这个老反革命趁毛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談判的机会，作了《对出发东北工作同志的报告》，大肆散布和平幻想，贩卖其“和平民主新阶段”里的黑貨。十月五日刘少奇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为了国内和平和远东和平，起来奋斗》的黑社論，竭力美化美蔣反动派，麻痹革命人民斗志。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在毛主席发表了“重庆談判”后二个半月，刘少奇抛出“时局問題的报告”、

“目前形势与任务”两株大毒草，更加明目張胆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系統地贩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謬論。特别是“时局問題的报告”，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綱領。

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謬論与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对立在什么地方？

下面分三个問題来講：

1. 要不要准备打仗？（即对形势的估計）

2. 要保存人民武裝，还是把人民武裝交出去？

3. 要不要武裝夺取政权？

1. 要不要准备打仗？（就是对形势問題的分析）。刘少奇說“不要”，他胡說什么当时“全世界是个和平民主团結的世界”，“全世界的和平建設阶段来了，不打仗了，要搞和平，还是持久的和平”。还說什么：“中国已經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甚至还极力美化美蔣反动派，說“美国也不愿意中国打仗（內战）”，蔣介石也“要真正商量几个問題。”真是胡說八道。刘少奇散布的这些謬論，完全抹杀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性，完

全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毛主席指出：我們共产党不要打內战，是坚决反对內战的。“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战危險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蔣介石的方針已经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战的。”所以毛主席特別強調：“我們要有准备。”要解放区人民不能丧失警惕，思想上不能麻痹。事实上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軍事、經濟的支持下，大力調兵遣將，不断地向解放区进攻，就是在談判中也是进攻我們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国民党胡宗南匪軍进攻陝甘宁边区；九月（就在刘少奇第一个黑报告講后沒有几天）閻錫山匪軍进攻山西上党地区；九、十月間，国民党匪軍进攻河北邯鄲地区；八月到十月間国民党匪軍又进攻鄂豫解放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炮声不絕，刘少奇却散布“和平主义神話”。其目的岂不是要麻痹革命

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在美蔣反动派的进攻面前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因而失敗嗎？这是很明显的阴谋。

2. 要保存人民武装，还是把人民武装交出去？刘少奇一口咬定說“武装斗争是一般地停止了”，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于是他要党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公然提出把我們的军队整編“成为国軍、国防軍、保安队、自卫队”。甚至要我們党“停止对军队的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指令”。党不领导军队，这个军队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綫呢？一句話，就是要我們党向国民党交出武装。这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

刘少奇还假借中央名义，把他的投降主义黑貨向各解放区推銷。（46. 2. 1他发出《目前形势的任务》的指示），在他

的投降主义思想指导下，他說不打仗了，軍隊不要了。所以有些解放区大批复員，裁減軍隊，給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帶來严重的損害。

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英明指出：“人民的武裝，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毛主席的這些高瞻遠矚的英明指示，極大地教育和武裝了人民。

劉少奇鼓吹要“交槍”，還有它當時的國際背景。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股投降“交槍”的逆流。當時，法修頭目多烈士出賣了在法西斯戰爭中解放了大片國土的法共游擊隊，拱手交出了幾十萬支槍（五十萬人的人民武裝）。多烈士從國外回到法國后就出賣了革命。他自己換了一頂“副總理”的烏紗帽；意修

头目陶里亚蒂也一样，交出了二十五万人的人民武装，他自己到资产阶级政府当了一个“部长”“副总理”的官职，而使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胜利果实，统统化为乌有；又如希腊共产党快打到首都雅典了，也交了枪。他们的结果怎样呢？枪交了，“合法”地位取消了，大批真正的革命党人惨遭杀害。革命的成果就被这批修正主义者、工贼出卖了。当时这股逆流在中国也有影响。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和国内的投降“交枪”逆流。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国际上的暂时妥协，并不等于国内也要妥协。当时

一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修正主义者就搞了国内的妥协，結果枪交了，地位也沒有了，不起作用了。如法国，开始在議會里还有几个共产党人，后来經過几次修改宪法，就沒有他們的地位了。中国人民正是由于伟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保住了这支強大的人民武裝，使革命的胜利有了根本的保证，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

3. 要不要武裝夺取政权？刘少奇說“不要”，要走“議會道路”。說是因为什么“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議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羣众斗争和議會斗争”。他主張“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轉变”，“要会作宣傳、会演說、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說什么要“善于在議會里演說，能用演說的道理把人家冲走”。这完全是胡說八道，沒有武裝怎么能把人家冲走呢？这样“中国革命才会

繼續前進，中國革命才會取得勝利”。甚至還說“我們有些人”要到國民黨政府里去“做官了”，等等，真是神魂顛倒，胡言亂語。不過，也充分暴露劉少奇是個“議會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告訴我們：大大小小的修正主義者從來就是“議會迷”，他們無一例外地否認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一向以資產階級議會作為交易所，干着出賣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勾當，成為工人階級最可恥的叛徒。

列寧早就批判了這些“議會迷”。他說：“如果把階級鬥爭局限於議會鬥爭，或者認為議會鬥爭是最高的、決定性的、支配着其餘一切的鬥爭形式的鬥爭，那就是實際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對無產階級。”毛主席也指出：中國“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

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刘少奇鼓吹走“议会道路”，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则，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他这一套谬论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受到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对。以后，在国民党发动全面的反革命战争面前，也就彻底破产了。

当蒋介石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后，为了胜利，进行自卫战争，进一步从武装夺取政权，发展和巩固解放区党、人民军队，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进行土地改革。毛主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

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要坚决、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决定性的环节又是整顿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

在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刻，刘少奇又出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过，这时他变换了一套策略，从“左”的方面来破坏革命。从右倾投降主义转到“左”倾机会主义。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破坏土改、整党，破坏党的政策，妄图削弱解放军的后方，使解放战争遭到失败。

刘少奇这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特点是用削弱党的组织，打击无产阶级同盟军，破坏党的政策，来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的主要内容是：

(1)破坏毛主席提出的“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

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的土地总路綫。破坏毛主席的土改总路綫，鼓动羣众侵犯中农利益。他提出“抽分”中农土地，甚至“斗争”中农的錯誤口号。

(2) 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在整党中，首先要开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彻底地揭发各地組織內的离开党的路綫的錯誤思想和严重現象的方針。而刘少奇推行“派出工作組，組織貧农团，超越党支部，进行搬石头，踢开区村干部”的打击一大片的反动路綫。他說党員干部是阻碍革命的石头。把党支部和党員講得一团黑。說党員都是地主富农。少数不明真相的羣众吊打我們的党員和干部。刘少奇說是“正义行动”。

(3) 对抗毛主席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而刘少奇提出：搞垮地主在城市經營的工商业的錯誤政策。破坏解放区工商业經濟的发展。

(4)不顧毛主席关于“坚持少杀、严禁乱杀”的教导。刘少奇却故意恣意乱打乱杀,破坏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說:“地主杀我們一百,我們杀他們一千。”他有时又說不能杀。下面杀了,他又慌了,又馬上停止。結果使那里的土改不能进行。

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及时发现和制止了这条錯誤路綫。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中央召开的會議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一年多解放战争的經驗,提出了进一步完成“打倒蔣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一伟大战略任务,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路綫、方針、政策。随后,毛主席又集中精力写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規定了一整套无产階級的政策,全面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綫,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伟大統帥毛主席的率領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摧毀了蔣家皇朝，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反動軍隊，解放了全中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伟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伟大勝利的時刻，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們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舉行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上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報告。毛主席的報告，是一個具有划時代意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它深刻地總結了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分析了民主革命獲得基本勝利後階級鬥爭的新形勢；提出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報告是反對劉少奇修正主義，反對“左”右傾機會

主义路綫的思想武器。这次大会，标志着两条路綫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志們，我們从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斗争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已經斗争了四十多年。在每一个重要时刻，刘少奇总是代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一条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相对抗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綫。妄图破坏革命。每当这种关头，毛主席总是与他开展針鋒相对的斗争，并战胜了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綫，撥正了运动的航向，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林副主席告訴我們：“我們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

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個經驗。”

讓我們吸取黨的兩條路線鬥爭的這一經驗，緊跟毛主席，永遠鬧革命！

党内两条路綫斗争史

第四讲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怎样 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2)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綫的斗争

(录音稿。未經本人审閱)

战友們，同志們！

“三办”領導上和各位老師傅要我們來作一個學習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史的匯報發言，這是對我們很大的鼓勵和信任，是督促我們作更認真地學習，也是能將我們

在認識和理解上的錯誤缺点，取得領導上和各位老師傅批評幫助的一個極好機會。

通過這一次的進一步學習，我們深深感到學習建國以來，也就是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二十年是毛澤東思想更大發展的二十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更大勝利的二十年。也是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反動路線更加暴露到徹底粉碎的二十年。

劉少奇叛徒集團是四十八年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總代表；是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在黨內的總代表，我們黨和劉少奇叛徒集團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同陳獨秀叛徒集團、王明叛徒集團鬥爭的繼續，是同國民黨反動派、資產階級、一切剝削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鬥爭的中心問題，始終是政權問題。

学习这个时期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着重要学习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上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等光輝著作和林副主席在“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

根据这些文献的学习，下面分三部份汇报：

第一部份是：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打破刘少奇推行資本主义的罪惡阴谋。

第二部份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复辟資本主义的阴谋。

第三部份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刘

少奇叛徒集团的彻底复灭。

最后汇报一点粗淺体会。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打破刘少奇推行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粉碎了刘少奇那个妄想要維護着美、蔣反动統治的所謂“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路綫。領導全国人民举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彻底推翻了美蔣反动統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綫斗争的焦点是：剛剛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一

个关系到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問題上，毛主席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同刘少奇的資产階級反动路綫，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斗争。这是一场比夺取政权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斗争。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两条路綫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論，指出了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后，必須立即轉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坚持和巩固无产階級专政，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科学地、深刻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后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指出了正確路綫和錯誤路綫在各个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指出国内的基本矛盾將是“工人阶级和資产阶级

的矛盾”，強調“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毛主席在報告中指出了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為“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規定了極其明確的路綫、方針、政策。

毛主席還教導我們：“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的這篇光輝著作，提出了我國過渡時期總路綫的總綱領，也是我

們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綫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强大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号代理人刘少奇，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四月，他就跑到天津去，实际上不但跑到天津，他在北京和天津来来往往，大肆鼓吹和推行他那条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綫。这时，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綫的斗争，具体表现在那里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对个体的农业、手工业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方面。

1.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利用限制，改造，还是让它无限制地发展？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明确指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

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並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

對毛主席這一系列的重要指導，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的頭號代理人瘋狂反對，胡說什麼：“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發展。”胡說“要發展他們的剝削”，“剝削有功”，“賺多少錢都是合法的，”如果是讓資本主義賺多少錢，都是合法的話，那還叫什麼社會主義啊！？很清楚，他就是要資本主義無限制地發展。他這種反動論調，不斷宣揚，到一九五一年，就進一步提出。“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反動口號。這個反動口號實際上是要鞏固資本

主义，在政治上要巩固资产阶级的政位，在经济上要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要限制，不要改造。所以这个反动口号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资产阶级对这个反动纲领是心领神会，兴高彩烈得很。上海的那些资本家，那时就大叫“新民主主义万万岁”，上呼下应，紧密配合。在刘少奇这条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的煽动和支持下，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对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他们大搞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他们利令智昏地叫嚷说：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蚍蜉撼树谈何易”，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地反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对刘少奇叛徒集团推行

資本主义阴谋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农业方面）

2. 对个体农业，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任其自流？

毛主席講：“中国的問題始終是农民同盟軍的問題。”毛主席是历来非常重視工农联盟問題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能不能在新的基层上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問題，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核心問題。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在土地革命之后，立即把个体农业經濟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因为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农业經濟，它的自发傾向不是社会主义，而

是資本主义。所以，列宁講，小农经济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資本主义。因此土改之后，如果不去积极引导，任其自流，必然要发生两极分化，极少部份要产生新富农，极大部份貧下中农要陷入解放前那样无地缺地的貧困境地。另一方面，农村的陣地就会被資本主义所占领。这样下去，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农联盟勢必要遭到破坏，工人阶级就会失掉这个最重要的同盟軍，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正因为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关系到两条道路斗争的核心，这样一个重要問題。所以毛主席指示：“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資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毛主席这一系列

的重要指示，对农村經濟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明确具体地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在城市，主張无限制地发展資本主义；在农村，主張大大发展富农經濟，反对广大貧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在政协会議上作报告中，公然宣称“保存富农經濟”是“一种长期政策”。还荒謬地提出“應該大大发展”富农經濟。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对个体农业經濟不能任其自流的指示，惡狠狠地說：“什么是任其自流？雇工，单干應該放任自流，讓他有三匹馬一付犁就好，对于不讓单干，不讓雇工的不能放任，对于沒有三匹馬的不能放任。”同志們，我們知道能雇工的是誰？熱衷于单干的是誰？是富农，是富裕中农。有三匹馬一付犁的是誰？是富农。对富农，对

富裕中农，刘少奇就認為“好”，要讓他們“放任”发展。而对反对雇工，反对单干，沒有三匹馬的是誰？是广大貧下中农。他却說“不能放任”。这就是不許貧下中农去干涉、限制富农。看，这个极端仇視社会主义头号的走資派，他只許有发展資本主义的自由，不許社会主义有发展的自由，不許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有限制、改造的自由。他还污蔑把农业互助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張是“一种危險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針對刘少奇发展資本主义，破坏工农联盟的罪惡活动，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中指出：“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否认現在业已出現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

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錯誤思想。”一九五二年年底，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綫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綫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錯誤。”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迎头痛击了刘少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宣告了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动綱領的彻底破产。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新胜利，到一

九五五年，全國農村出現了社會主義高潮，農業合作化運動蓬勃發展。就在這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鬥爭進入決定性勝利的重要關頭，劉少奇再一次跳出來進行破壞。他那個要想阻擋、不讓搞合作社的陰謀不能得逞後，這時他換了一個手法，就借口要“整頓”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五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召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他們大肆叫嚷說：合作化運動“冒進”了，提了兩條黑理由，一是“超過了羣眾的覺悟水平”；二是“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要“趕快下馬”。他所講的干部，不是指一般的工作人員，是影射我們黨，就是說超過了我們黨的經驗水平，等等。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制定了個“停”、“縮”、“整”的反動方針。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里，被他們“砍”掉了二十萬個合作社。這

也是被他們的資反路線搞得烏云滿天的“五十天”。七月底偉大領袖毛主席回到北京，召開了省、市委和區委書記會議。在會上毛主席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重要講話。肯定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大方向完全對的，說“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針對劉少奇這一伙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超過了羣眾的覺悟水平”、“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的謬論，明確指出：“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我們經常學習的《語錄》、老三段，第三頁第二節“我們應當相信羣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出的最高指示，毛主席

又針對他們叫嚷：“不趕快下馬”就會破壞工农聯盟的荒謬論調，主席嚴肅地指出：“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农聯盟的危險。這裡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主席對他們大批砍掉合作社的罪惡活動是很生氣的，批判他們對發展鞏固合作社是“消極地避開”，對“一刀‘砍掉’多少合作社，採取十分積極的態度，。”我們學《語錄》經常學的107頁那段（击一猛掌）就是那個時候對這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瞎子”講的。主席的最高指示都是既有深刻的含義，又是有具體內容，針對性很強的。主席的這些指示，我們當時都看到的，學過的，可是根本沒有學懂；今天，回顧這段歷史，聯繫當時的兩條路線鬥爭來學，理解得更深一些。

我們在城市的人，過去對農村，對合作化運動是關心很少的，對農業合作化的意義認識是很差的。這次在學習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中，重學了主席的有關著作，主席把農業合作化高潮的一九五五年，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定勝負的一年。”一九五五年十月，召開了黨七屆六中全會，根據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主席在會議總結中進一步批判了劉少奇的反動路線，說：“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資產階級的綱領，是反二中全會決議的，提出這樣的口號，是綱領性的錯誤。”主席批判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主席批判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

主意。”经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决斗争，又一次粉碎了刘少奇的反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国一亿一千多万农户中，有七千多万户进入了合作社。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这时资产阶级，他的原料供应到市场供销，都控制在我們手里，两头都給他截住了，没有办法了，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刘少奇无限制发展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

刘少奇的这条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动纲领，是有它反动的理论基础。就是林副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唯生产力论》。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呢？修正主义的东西，

別別扭扭的，我們主要看它的實質。按照這種“理論”，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農村還是分散落后的，就不應該也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應該也不可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應當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到資本主義發展到生產過剩的時候，才能搞社會主義。按照他們這種“理論”，社會的發展，只是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生產工具和技術發展的結果。這就是蘇修赫魯曉夫大白菜要爛了的觀點，就是說資本主義你不要去搞它，跟大白菜一樣的，養着養着，到時候自己會爛的，也是一路貨。就是說，只要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主義自然而然會來了。用不到無產階級自覺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種反動的理論實質是什麼呢？就是反對搞社會主義革命，保護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反動理論並不是什麼新鮮貨，已

存在了半个世紀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布哈林，到中国的陈独秀、刘少奇，都是用这个反动理論来保護資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为了反对这种“理論”，列宁和毛主席都作了有力的斗争。毛主席总是強調革命对发展生产的伟大作用，強調改变生产关系对促使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作用。并且反复闡明了有党的领导，有巩固工农联盟，有充滿革命干劲的广大革命羣众，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完全能夠把自己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彻底宣告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論》的破产，彻底打破了刘少奇实行資本主义的罪惡阴谋。

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复辟資本主义的阴谋。

这一部份分四个小点：

1.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对这个重大问题的不同回答，就表现了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因为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林副主席在总结党的四十八年路线斗争中，“紧

要关头”四个字，只有在这里用了一次。在学习中，我們感到林副主席这样的概括和这样的提出問題，是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极为丰富的內容的。我們回顧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把当时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綫斗争大量的事实把它概括了。

当时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背叛了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說，大反斯大林，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綫。（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当时修正主义思潮大为泛滥，十分囂張，英国党搞掉了四分之一，瑞士党搞掉了一半。当然有些党本来就是修字号的。在国

內，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不甘心的，對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使資產階級右派增加了一種幻想，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的國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變質。他們蠢蠢欲動，也想在中國也來個匈牙利事件，把中國拉回到資本主義道路去。那時，資產階級在黨內的頭號代理人劉少奇又大肆活躍起來了，一方面與蘇修互相呼應，對赫光禿頭大肆吹捧。一方面在國內竭力煽動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劉少奇公然叫囂說什麼：如果“認為只有我們的制度是好的，別的都是不妥當的，那是不好。”他所指的制度是指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說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不能說“好”。又胡說“政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一點上議院、下議院的性質”。上議院、下議院是英國資產

階級搞的那一套假民主，都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这个大叛徒，狗叛徒，就是这样公开地污蔑我們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鮮血去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資產階級的假民主。这样露骨地煽動資產階級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同志們，我們过去对这一点認識是不清的，以为右派进攻主要是民主党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的，現在弄清楚了，是在这个大叛徒的煽動支持下干的。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在他这个最大的黑后台的支持，过去章伯鈞这个家伙提出什么“上議院、下議院，政治設計院”，还以为他是最早放的，現在查清楚了，实际上是刘少奇是早說的。就在他的煽動和支持下，資產階級右派上竄下跳，八方呼应，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主义”的制度。这些右派說“政协、人大，……應該是政治上的設計院”。就是

要讓他們資产階級來掌權。

正如林副主席在《政治報告》中說的，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鑒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猖狂和我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這個偉大著作，全面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毛主席提醒全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針對劉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謂“我國社會

主义和资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决了”的謬論。毛主席特別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既是針對刘少奇的謬論，是有所指的。更重要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在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需要繼續革命。毛主席的这篇光輝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繼續革命的伟大綱領，是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澤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阶级斗争总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

盾的問題》发表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打着人民内部这个招牌，利用人民内部这个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妄图推翻党的领导。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是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刘少奇在四月先后到广州、上海、河南等地大肆贩卖“階級斗争熄灭論”，同毛主席唱反調，为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打掩護。就在他贩卖“階級斗争熄灭論”的同时，資產階級右派就在四月、五月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全面进攻。我們联系历史来看他的“階級斗争熄灭論”是为誰服务的，是很清楚的。資產階級右派公然叫囂要“輪流执政”，“要共产党下台”，实質上是个政权問題。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党内通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

及时地向全党敲起警鐘。指出：“在共产党内部，……又有一部份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錯誤思想。这些人比較危險……。現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吹响了反击資產階級右派的进軍号，开展了轟轟烈烈的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争。在反右派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重要社論，提出：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綫問題上没有調和的余地。”这个重要指示。接着，在十月，毛主席在青島同各省、市委書記談話中明確指出：“单有在经济战綫上（在生产資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須还有一个政治战綫上和一个思想战綫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

命。”

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的照耀下，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在所有制解决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2 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我国人民在取得了所有制的改造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大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的精神大大发扬，资本主义的邪气受到沉重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

胜利，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灭亡，也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地反抗。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黑干将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五九年八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抛出了所谓“意见书”，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领导，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他们的许多黑论点，总起来就是妄图推翻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实质上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从庐山会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彭德怀的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是由来已久的。远的不说，建国以后，一九五三

年彭德怀就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党联盟，他們里通外国，搞两面派手法，阴谋篡党篡軍。所以，彭德怀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的反党活动，是五三年高、饒反党联盟事件的繼續，也是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繼續和发展。五七年主要打击了社会上的右派，五九年，这个党内的大右派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对党、对毛主席进行猖狂的进攻。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争，是一場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繼續。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紀，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主席这段話，不仅說明了廬山會議这场斗争的实质；这个天才的科学論断也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所证

实，是完全正确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是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包庇下进行的。经过庐山这场斗争，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彭德怀打败了，罢了他的官。这也是对刘少奇这个黑司令部的一个沉重打击。在这场斗争中，林副主席挺身而出，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三面红旗。从此之后，由林副主席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里，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加强革命化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进到空前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回过头看看这段斗争历史，就比较能理解林副主席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这个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最重要的战略措施，现在看来，如果不是

毛主席，在五九年罷了他們的官，奪回了軍權。如果軍權還在彭德懷這些人手里，那麼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將會出現些什麼樣的局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一系列的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過去根本不理解，只以為揪出了幾個野心家，幾個壞人。經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來回顧這段鬥爭歷史，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英明，對林副主席的英明、正確，體會得更深，熱愛得更深。

3. 關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大辯論。

毛主席教導我們：“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階級斗争的性質，并且总是同國際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這是歷史的總

結。回顧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事實也是如此。劉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並不甘心於他們的一次次失敗，一九六二年，他們趁國際上帝、修、反的一股反華逆流，和我國的暫時困難。在這樣國際國內的歷史背景下，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會議上》（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親自出馬，赤膊上陣，以前都是他的黑干將上陣的。向毛主席、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動了猖狂進攻，散布他修正主義的一套，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猖狂攻擊。胡說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意思是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出了毛病。胡說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許好一點”。他還明目張膽地為彭德懷翻案，說彭德懷那個《意見書》“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不僅如此，還為他的一小撮小嘍囉翻案，他說：“和彭德懷

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等等。这些家伙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是他们反革命面貌进一步暴露的时候。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就在这次会议上，针对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向全党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还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这是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本质。林副主席在会上同刘少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林副主席指出：“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党的创造。”林副主席指出：要使我们的党从胜利走向胜

利，必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澤東思想是在任何工作中永遠是第一位的，是起決定作用的，是靈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林副主席的講話捍衛了毛主席在我們黨的最高地位，捍衛了三面紅旗，給他們沉重地大打擊。

“七千人大會”以後，劉少奇一伙的反革命活動並沒有收斂，到處煽陰風，點鬼火。他一面竭力煽動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大搞“三自一包”。這段我們是記憶猶新的，那時上海的市場上資本主義勢力也是泛濫得很厲害。一方面大造復辟資本主義的輿論，在文藝界，為他樹碑立傳的《燎原》、《海瑞罵皇帝》、《謝瑤環》等大毒草紛紛出籠，並再次拋出他的黑《修養》。在黨內又歪曲毛主席關於輪訓干部的指示精神，他大搞干部輪訓，在輪訓中大刮自

由化风、翻案风，煽动干部反党。实际上好多輪訓干部的学习班，就变成裴多菲俱乐部。不少犯錯誤的干部的三反言論，就是这个时候在刘少奇的煽动下犯的。总之，刘少奇的資产階級司令部，糾集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在各个領域进行了全面的复辟活动。

为了反击这股复辟資本主义的逆流，一九六二年八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會議。九月，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會議上毛主席針對刘少奇一伙大搞复辟資本主义的反革命輿論，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輿論，总要先做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針對他們复辟資本主义的罪惡活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記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指出：“在社会

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認識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話，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現在起，必須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联系阶级斗争的历史，联系当时刘少奇这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事实，再領会毛主席所以这样指示我們，主要精神在那里，比过去就懂得更深了。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刹住了刘少奇一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从此，刘少奇就象一只“秋后的蚂蚱”，

一天天走向他的末日。

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两条路綫斗争。(即四清运动)

为了对“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鋒相对的斗争”，为了反击刘少奇一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一九六三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决定》明确规定社会主义教育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綱，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綱，依靠工人阶级、貧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毛主席已看到刘少奇这一伙是我們党内的大隱患，所以在《十条》中指

出：这次运动“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是关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并且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警告：“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記阶级斗争，不可忘記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記依靠貧农、下中农，不可忘記党的政策，不可忘記党的工作。”如果忘記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記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几年、十几年，多則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顏色了。請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今天我們再来重温这段最高指示，对其中的主要精神就理解得更深了。主席就是看到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用这样严重的口气，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警告，要注意这种危险！

毛主席的严正警告，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刘少奇一伙的反动的阶级本性。他们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把社教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和《后十条》等黑货。它是什么内容，什么实质呢？总起来讲，一是改变运动的性质，什么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呀，什么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呀，主席都批判过了。二是转移斗争的目标，他的罪恶目的是打击革命群众，打击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

毛主席看到刘少奇这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给社教运动造成严重危害，在一九六四年底，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泡制的《后十条》的，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谬论，第

一次明確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从今天来理解：这实际上是給我們指出了，这些走资派的总后台，在上面，在上面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毛主席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刘少奇那条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綫的破产。在毛主席革命路綫指引下，社教运动取得了伟大成果，也为接着而来的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

三、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彻底复灭。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为什么

不断遇到抵制和干扰？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一阵又一阵地泛滥？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暗藏着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回顾以上这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主席总结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刘少奇这一伙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事实，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

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形式，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大革命，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推进到一个更加深入、更加广阔的新阶段。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场大决战。

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为这场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危害最大的是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和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而刘少奇叛徒集团，看到他们末日要来临，他们要完蛋了，拚命垂死挣扎。就

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場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將无产阶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五十天的資反路綫。

正在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头，也就是这次大革命中途夭折，还是向縱深发展的紧要关头，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发表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宣告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彻底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取得了伟大胜利。

同志們，我們今天重溫一下毛主席关于揭露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指示，对毛主席在两条路綫斗争中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理解得比过去深得多

了。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我們黨內有些人有修正主義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一九五八年提出，要注意黨會分裂。并警告這些人，你們這樣搞要“跌跟頭”，沒有好結果的。

一九五九年提出，黨中央里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一九六二年提出，要注意中央出修正主義。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起來造反。

一九六三年提出，要警惕反革命復辟，走資派在中央有根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提出，要揭露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到六六年八月，毛主席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親自揭開了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蓋子。

同志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這

样一步深一步地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引导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大决战的。并且，亲自领导了这场大决战取得伟大胜利的。

在揪出了刘少奇这个头号走资派以后，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就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宣告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召开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高举毛澤东思想伟大紅旗，对我們党的48年来的革命斗争經驗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經驗，作了全面的系統的总结。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伟大战略任务。大会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重要講話、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鼓舞着全党、全軍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照耀着我們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论，是我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們加强全党、全軍和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們进一步建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我們学习党

內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論学到手，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自覺性，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这次学习，我們感到有几点初步的体会：

第一、首先要充分認識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論，是对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的貢獻，它标志着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三个里程碑。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資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沒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是集中在政权問題上？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誰的

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沒有解决，从理論上到实践上都沒有解决，只有沉痛的教訓，还没有成功的經驗。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他們是处于无产階級革命准备的阶段，沒有遇到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的問題，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看到无产階級在夺取政权后，資产階級的拚命反抗，要強化无产階級专政。但列宁过早去世了，沒有来得及解决这些問題。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时期里，他曾十分注意社会主义社会的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专政，并同党內的資产階級代理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但是斯大林在理論上，不承認在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階級和階級斗争，不承認搞不

好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到一九三六年，即苏联全盘合作化后，他在宪法报告中說国内的阶级完全消灭了。他在临死的前一年，他已經觉察到这点，但也沒有解决。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后，利用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个錯誤，提出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綫，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大的教訓。

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充分注意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的历史經驗。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和重要指示中，和这次亲自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的問題。这是标志着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段，即毛澤东思想阶段。是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綫、方針、政策，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路明灯。只要我們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前进，就能夠明确革命的性質、任务、目的，就能夠明确革命的对象、动力，就能夠正确处理敌、友、我三方面的关系，就能夠取得不断胜利，保证我們的国家和党永不变色。

第二、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实现思想革命化，做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派。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規定：“党的最終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为解放全人类，为在全

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要树立这样一个世界观，就必须自觉地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我们深深感到，没有对自己思想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就不可能对社会上，对客观世界的继续革命起促进作用；如果对自己思想上的革命不是继续，而是停止了，那必然会成为社会上继续革命的消极因素甚至要走到对立面去。

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曾经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参加革命时能够勉强地同意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是他们从来不打算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到了革命的转折关头，就要掉队，被历史淘汰。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人只想“打鬼子，保家乡”。抗日战争一胜利，就不想

干了。有这种思想的人，他对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必然辨别不清，甚至会同情，会共鳴。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有的人只是想到“推翻蔣介石，打倒地主分土地”。全国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就不想干了。他只求去掉身上的压迫，能“自由发展”就行了。他也必然对刘少奇的发展“三馬一犂”的富农路綫辨别不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犯走資派錯誤的人，不少就是进城后不想再艰苦奋斗了，只想舒舒服服，安安稳稳过日子，沒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沒有繼續革命思想，必然会很自然地接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綫，成为修正主义的工具。其中有的本身已經蜕化为修正主义者。我們在学习中，不少同志都感到，我們过去所以会犯这样那样的錯誤，除了中刘少奇的流毒这个外因，总还有内因的一

方面，就是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級思想，不自覺革命，又怕痛怕羞不自覺改造。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指出：“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們夺了权，无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的斗争就消失了。”因此，我們感到必須加強自身的思想革命化，才能增加对各种錯誤傾向的識別能力，才能对各种資产阶級思想增強抵抗能力，才能在无产阶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中，做一名彻底的无产阶級革命派。

战友們，同志們！我今天汇报就到这里，在講的里边，肯定会有缺点錯誤，因此，恳切希望各位 老师傅 給我們批評帮助。完了。